

二十世紀臺灣服飾 變遷因素之探討

撰文／葉立誠



▲ 1900 -10 年台灣民衆都穿著中式傳統服飾。女性不分長幼髮型都是一致的「鉸剪眉」式；服裝為上著大衫衫（其款式較之前為窄長，女裝領型也變的較高）；下則分別著中式裙與褲。〔本圖由顏施家族提供〕圖 1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有關以「台灣本土文化」作為研究主題的風氣，大約是從1970年代開始受到重視，至於在服飾研究領域裡，出現較有系統的「台灣服飾歷史與文化」研究與專書，則要遲至1981年四月才由實踐家專師生以「台灣服裝歷史」為內容，出版為名《繼往開來》的專刊；以及在同年六月，有林成子教授提

· 葉立誠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專任講師



▲ 在1905年代的台灣，我們看到照片中五位男士的服儀，除四位一般採清季時期的制度外；但也出現一位完全是採西式的穿著與形象。這顯示台灣衣飾文化出現「異質性」的變化。〔本圖取自賴志彰（編著），台灣霧峰林家留真集，台北：自立報系文化，1989，頁069〕圖2

出《六堆客家傳統衣飾的探討》之論文。當然由於這些專書與論文的出版，也引起國內對「台灣服飾的探討」有了關注的回響，而陸續出現從「傳統」或「民俗」的角度，推出針對「台灣服飾」為主題的專書或研究。

繼之而後，隨著國內在政治環境、政治態度；以及國家定位轉變的影響，這使得國人對「自我識別認知」，由自許為「中國人」轉而以所謂的「新台灣人」來自居。就在這種政治局勢使然之下，也激起更多的學者，

對台灣衣飾文化的研究，投以更多的心力。

然而，綜觀有關「台灣服飾」的研究，由過去累積至今，雖然在多位研究者的努力之下，已有相當不錯的成果，不過基本上這些論著與研究，其主要的內容，大都把焦點集中在服飾外觀表象的解說為主，即是將重點放在「是什麼」這種單純說明式的介紹，而忽略「為什麼」這種較深入的分析，尤其是鮮少從「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不同角度，進行檢驗與論述。再則，過去「台灣服飾」的研究，在時間背景的選擇上較為片斷，缺乏完整性，尤其是未見完整針對二十世紀這百年的歷史背景，進行「服飾變遷的發展與原因」的研究。正因如此，這也使得台灣服飾在學術研究，總是被譏為深度性不夠或欠缺完整性的遺憾。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研究者特別選擇「二十世紀台灣服飾變遷因素之探討」此一主題，試圖藉由當時發生在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重要事件，與「服飾變遷的現象」，其之間的關係，以探究出「影響台灣服飾發展與變遷真正因素之所在」。

（二）、研究目的

針對上述研究動機的理念，研究者進一步提出三大研究目的：

1.期望在本次研究中，能透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重要事件，與「服飾變遷的現象」，其前後因果關係的探究，以發掘在不同時期階段，造成台灣服飾變遷的因素之所在，以為台灣服飾研究領域，尤其是在服飾變遷理論的建立上，能有突破而顯著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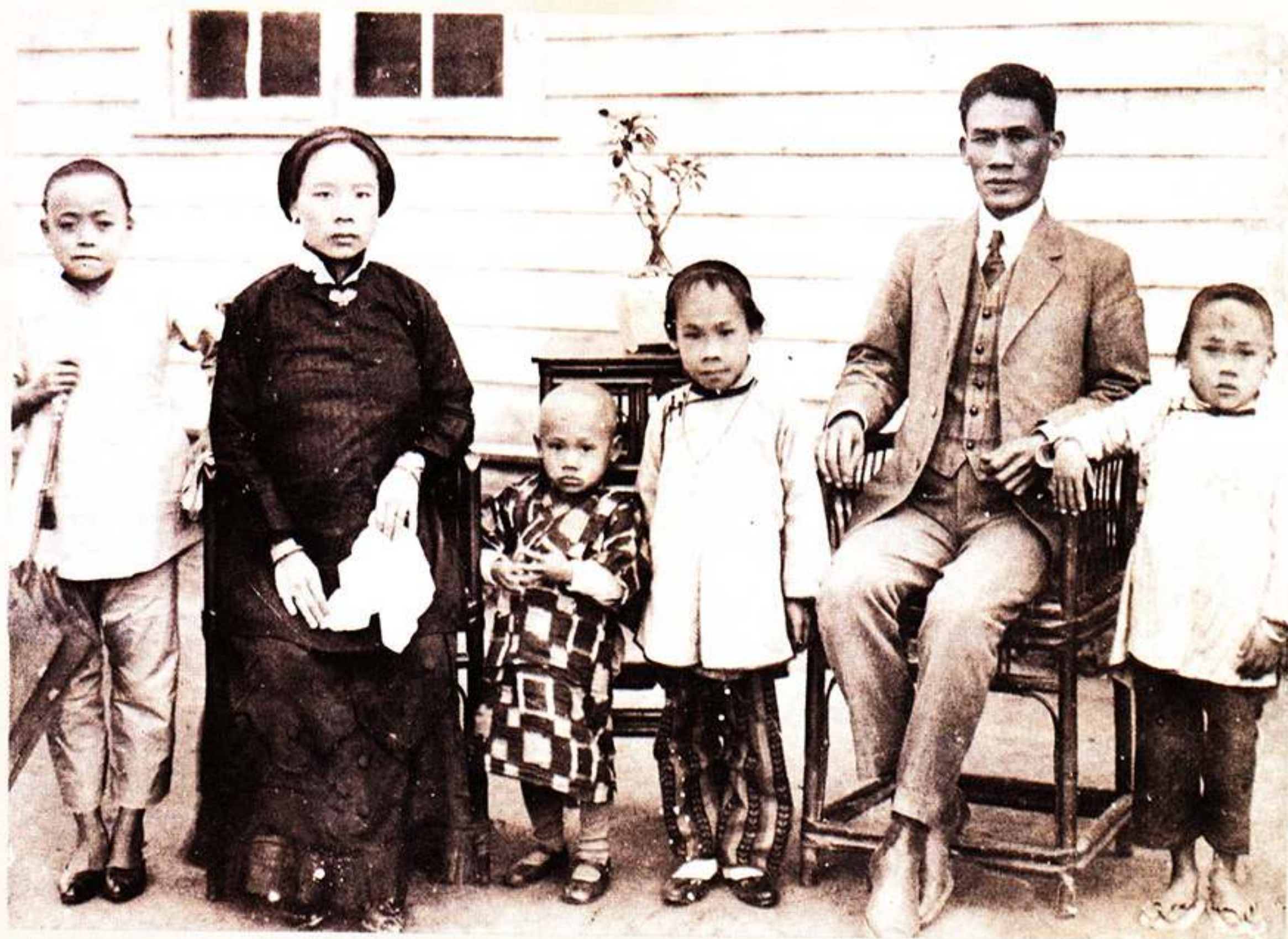
2.期望透過本次研究，能為學術邁向跨領域的思維，提供一個新的路向。因為在本次研究中，雖然是以「歷

史」為主軸，但其所涉及的卻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領域的不同面相，是跨領域的探討。而研究者個人也期盼與相信，經由這項概念的提出，將有助於日後在面對服飾此項課題，能以開闊性的角度來加以思考。

3.期望本次的研究目的，不單只是對台灣衣飾文化研究有所貢獻，更重要的是，期望藉由此項區域性的研究，能為研究人類物質文化的消長盛衰與變遷過程有所啟示。而這種宏觀的目的，適巧與研究者在2001年10月份參加國際知名社會學家華勒斯坦，來台一系列的座談與研討中，得到心心相印的呼應。因為這位「世界體系論」的創始人，之所以能有如此週延而宏觀論點，就是因為他長期從歷史的角度，來探索不同區域的變遷軌跡。這也正好呼應研究者個人，長久以來經營學術研究的目標是一致的。而此次以「台灣服飾」與「變遷理論」兩者的交會，就是著眼於建立「台灣服飾變遷體系」的一項努力。

二、研究問題

根據國內最主要研究社會變遷的學者，蔡文輝教授與葉至誠教授兩位的論點，他們在建構「影響社會變遷的因素」，雖然各有不同，但其主要都環扣在「政治」、「經濟」、「社會」三大層面之中，而唯獨忽略「文



▲ 1910年代台灣民衆的全家福合照（女性與孩童穿著中式服飾；男性則是完全西式的穿著），出現中西分野的審美價值。〔本圖由黃妙芬提供〕圖 3

化」此一項目的論說¹。

然而研究者認為，在我們生活之中，不論是就廣義或狹義的「文化」來看，「文化因素」都直接牽動我們穿著的態度價值與行為模式。也因此研究者就提出：「文化因素」是否是影響台灣服飾變遷的主要因素之一？作為本次研究的一項焦點問題。

另則，引起研究者相當好奇的是，造成變遷現象是只要「單一而獨立」的變遷因素就足已？抑是需要「多重而複雜」的多項變遷因素共同的影響才可？也因此，促使研究者以台灣服飾變遷為例，試圖找尋答案。故在本次研究中，研究者特別設定了第二個焦點問題：在同一個階段，造成台灣服飾變遷，是否都僅受到單獨因素的影響所致？

1 依據蔡文輝教授在其《社會變遷》一書中他歸納變遷因素有六大項，分別為「工藝技藝」、「意識價值」、「競爭與衝突」、「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至於葉至誠教授在其《蛻變的社會》一書中他歸納變遷因素有十大項，分別為「工藝技藝」、「人口因素」、「觀念與知識」、「環境因素」、「政治與經濟因素」、「傳播」、「侵略」、「競爭與衝突」、「社會的迷亂」、「資源不足」。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次研究在時間背景，是以二十世紀這百年為時間範疇。至於在服飾現象的論證，則是採巨觀的角度（非微視）來論述。由於本研究所採取的是整體性、重要項目的探討，而不就單獨性別的服飾款式或類別來加以細膩的分析。另外，雖然研究者在服飾穿著現象的檢證基礎，是憑藉多達十餘萬張的照片影像為主，但受限本文刊載篇幅的限制，而無法一一呈現，故僅以其中數幅照片代表之。不過，若有興趣者，可參考拙著在2001年所初版的《台灣服裝史》一書，相得呼應²。

四、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是以史學法則的文獻資料分析法與歸納法為主。在服飾款式現象與穿著方面，研究者是依據當時留存自今，多達十餘萬張的照片影像為主。至於在影響變遷因素文獻的證據，研究者是依據當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重要事件要聞為主。另研究者也參酌過去有關台灣服裝史方面的初級與次級史料文獻與研究，作為論述的基礎。

另外，本次研究是以「時間」與

「變遷因素」兩者關係，論證「造成台灣服飾現象變遷的原由」。其中在「變遷因素」項目涵及：政治體系、經濟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等四大主題。至於在「時間」的分野，為了尋求合理的「分野模式」，研究者仔細全面性的觀察過去有關「二十世紀台灣社會文化」的研究成果之後，發現最具代表的結構性分野，大致是按照「政體」作為區隔的基礎，即分為「日據時期」（從1895年至1945年）與「中華民國時期」（從1945年至2000年）兩大類。而其中在「日據時期」又按「主要政策」不同，區隔為「日據前期的綏撫時期」（1895年~1919年）、「日據中期的同化時期」（1919年~1937年）、「日據後期的皇民化時期」（1937年~1945年）；至於在「中華民國時期」，則從台灣光復之後，按年代來作區分，即分為「1945年~1959年」、「1960年~1969年」、「1970年~1979年」、「1980年~1989年」、「1990年~2000年」等五個時期。

故研究者是按這八個類別，分別來探討「政治體系」、「經濟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這四個因素，對「台灣服飾變遷影響」情形之探討的進行。

² 研究者曾在2001年初版的《台灣服裝史》一書，該書有二千張老照片可供作呼應參考。

貳、「日據前期的緩撫時期」（1895年~1919年）之論述

一、台灣服飾變遷受「政治體系」影響之分析



▲ 1910年代女性上著中式大衫衫，但下著「西式裙」；男士穿長袍馬褂，但已剪辮穿西式皮鞋。此顯示在同一個人身上，卻出現中西合璧兩種文化價值的穿著與服儀。〔本圖由江春枝提供〕圖4

之前清季時期的習慣，即以「傳統中式款式」為主。

不過，雖說日本殖民政府在執政初期對台灣民衆的穿著款式習慣採放任的態度，其實日本執政者，對於台灣民衆在服飾習慣中的男性「辮髮」與女性「纏足」這二項，卻是相當排斥反感，並視其為「弊風惡習」，但

自第一任樺山資紀到第六任安東真美，約二十年，因初據臺灣，百事待興，且義民反抗運動此起彼落，居民也需要加以安撫，又對臺灣人的風俗習慣不熟悉，故屬「緩撫時期」，政策上採寬猛並濟，目標則在建立臺灣為殖民地³。

首任總督樺山資紀的施政方針為暫採「放任主義」而漸近於同化，即不干涉臺人舊有的風俗習慣和特別立法。對各地士紳、富豪等社會領導階級採安撫和籠絡政策，以爭取其支持和合作⁴。

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在殖民臺灣之初，對臺灣民衆的風俗文化所作的策略，大都是採取維持現狀，這也使得當時台灣居民在服飾制度上仍維持著

礙於當時殖民之始，為避免引發島內紛爭與衝突，故也只好放任不敢斷然提出改革。

不過這種對臺灣陋習所採取的「完全放任政策」，到了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上台便開始有了轉變。而首先確立了鴉片的漸禁政策，並旋即在1897年1月頒佈

³ 簡後聰（編著），福爾摩沙傳奇－台灣的歷史源流（下冊），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2000，頁265。

⁴ 同前註，頁267。



【臺灣阿片令】，禁止一般人民吸食鴉片。同時亦確立辮髮、纏足的漸禁政策。不過除了總督府所主張的「漸禁政策」之外，其實在當時還出現兩種不同的看法：

其一是，日本政府內部另有人認為對臺灣風俗習慣應聽任其自然，勿率加干涉。

其二是，來自輿論界，他們認為將來若仍聽任成為日本國民的台籍人士辮髮漢服，實有損日本之體面，故建議立法頒佈斷髮、解纏之令。

雖然日本政府及輿論界對臺灣陋習各持「自由放任政策」與「積極變革政策」兩種極端不同的建議，不過臺灣總督府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及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則採取折衷的「緩慢漸進政策」。即此階段總督府對臺灣風俗中的辮髮、纏足，同視為是必須革除的陋習，但其處理原則是在漸禁的基礎下，透過學校教育或報章雜誌的宣導，鼓勵台人放族斷髮；而不以嚴格取締之令，立即求得變革舊俗及外表同化之效。正因為總督府漸禁政策態度並未積極，以致當時一般臺灣民衆的放足、剪辮未見熱烈響應配合。

但經過這番熱絡的推展宣導，其成效並不如預期的好，由於這個結果

也因而促使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改採強制的手段來處理台灣的陋習。

總督府首先針對女性纏足的陋習，於1911年訂定【保甲規約】，其規定清楚顯示罰金的處分：

「除蹠趾變曲無法恢復者外，未滿二十歲的纏足者均須解纏，對兒女絕不可纏足，違約者接受保甲處分之制裁，亦即是由保正、甲長審查其行為輕重，科以100日圓以下之罰金⁵。」

為落實【保甲規約】的推行，殖民政府並且在1914年3月12日，於台灣廳組織「風俗改良會」，藉此一併處理被視為是惡習的纏足、辮髮、鴉片等陋習的改革⁶。

由於這種藉由公權力的介入；以及法規明令禁止的「保甲制度」，之推行，這才使得女性「放足」真正產生奏效。

相較於「女性纏足」難改的問題，日本殖民政府在推動男性剪辮的情形就顯得容易、順利許多。雖然日本殖民政府在推動男性剪辮時，並未如同「女性纏足」一樣，頒布纏足禁令，但執政者卻積極透過社會上流階層之意見領袖的影響掀起斷髮的熱潮。例如透過召集各保正、甲長、壯丁團

5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第3915號，明治44年5月18日。《台灣時報》第22號，1911年5月，頁49-50。

6 張之傑（編著），台灣全記錄，台北：錦繡，1990，頁187。



▲ 1911年台灣中部推動「剪辮會」的情形。〔本圖取自賴志彰（編著），台灣霧峰林家留真集，台北：自立報系文化，1989，頁118-119〕圖5

員及紳等開會商，商討斷髮之方法⁷。

受到政治力有計劃的影響，都促使台灣地區「女性纏足、男性留辮」，在1910年代有顯著的變革。

二、台灣服飾變遷受「經濟體系」影響之分析

台灣工業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仍係以製糖工業為主，當時食品工業生產價值佔全台工業生產總值的86.3%，其中砂糖產值又佔食品工業產值的79.2%，而化學工業、窯業、機械器具工業、金屬食品工

業和紡織工業等的產值，全部加起來僅佔工業生產總值的8.2%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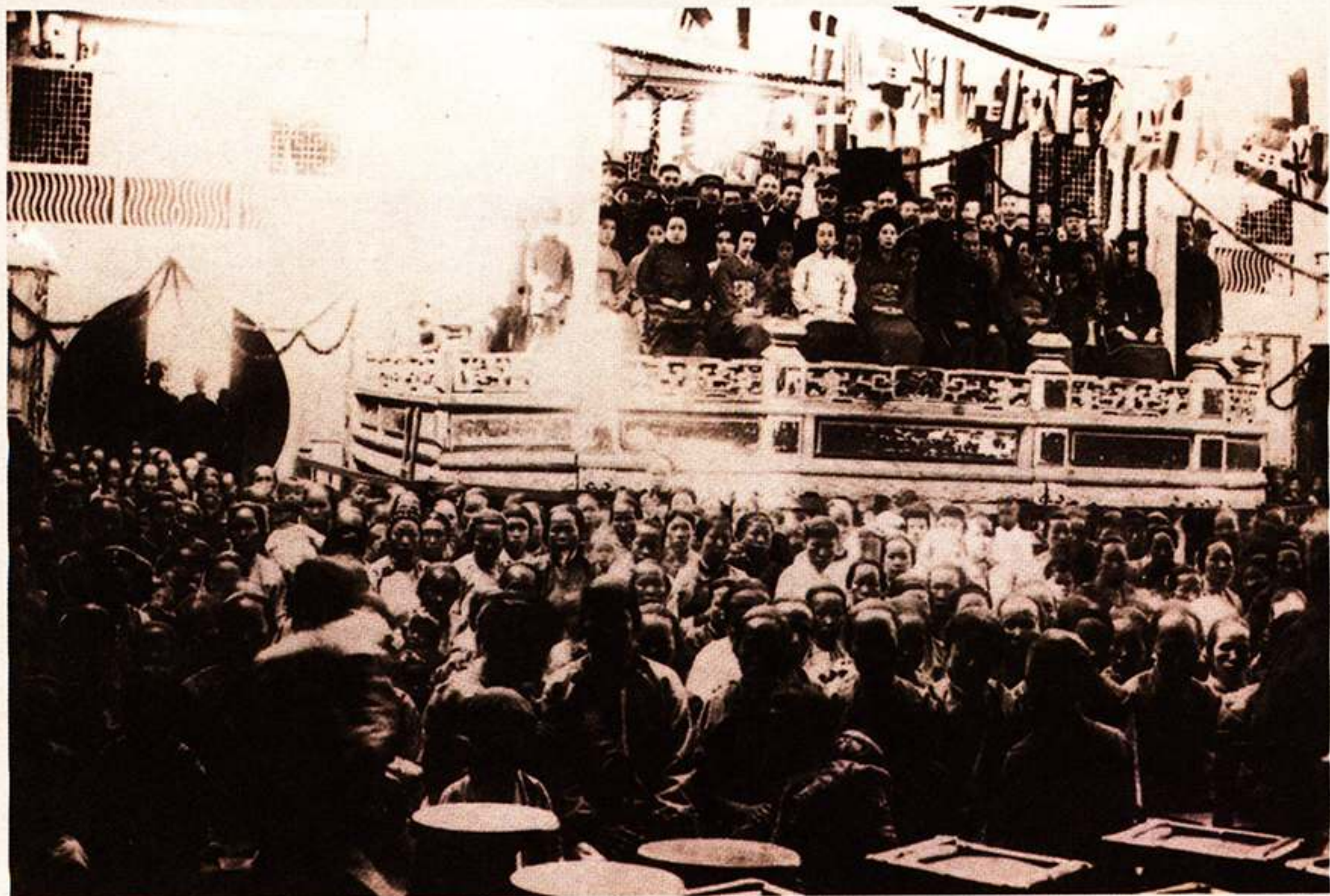
台灣的紡織工業，從什麼時候開始發展，無從稽考。在1902年，日人蒐集世界各地的黃麻種子，在台試行種植，成績尚稱良好，乃積極推廣。並於1905年在台中縣的豐原鎮，籌設一所黃麻紡織廠，即今工礦公司豐原紡織廠的前身，從事麻袋的生產。該廠於1907年開工，為台灣歷史最久遠的一所紡織廠⁹。

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島內的織品紡織工業並未不重視，這也使得

7 吳文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1995，頁295。

8 張宗漢，光復前台灣之工業化，頁24-27。

9 黃金鳳，臺灣地區紡織產業傳，台北：中華徵信所，1988，頁11。



▲ 1914年於台灣中部所舉行的「解開裹足會」。（本圖取自賴志彰（編著），台灣霧峰林家留真集，台北：自立報系文化，1989，頁120）圖 6

台灣所需的織品布料，大都需要仰賴日本或中國大陸海外的進口。而其中在布料上，因為中國大陸是台灣進口的大宗，這也使得台灣服飾的流行樣式款式，深受來自大陸的影響。故這也驗證了，在日據後期之前，台灣中式服飾其款式依循中國大陸東南地區流行的情形（台灣民衆其原鄉地）。

不過基本上，台灣民衆之間服飾的差異性，最主要還是受到個人家境經濟條件狀況的差別而不同。例如，約從一九〇〇年代的中期開始，一些家境環境較佳的大家族成員，其較前衛、先進接受西式觀念的年輕男士當中，從頭到腳已出現全盤西化穿著的情形。（圖1、圖2、圖3、圖4）

三、台灣服飾變遷受「社會體系」影響之分析

台灣地區的「放足剪辮」，除了受到日本殖民政府以「政治力」方式的介入，而達到改革成效之外；其實若無民間社會的呼應，是無法如此順利達成的。

就「解放纏足」方面而言，於1899年3月20日由台北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爲首，結合了四十位紳商向台北縣當局提出申請籌設「台北天然足會」組織（該會並於1900年2月6日獲准成立），宣傳「解纏足」運動。從此便正式開啓了臺灣放足運動，由民間台籍人士所推行之具組織性團體的

序幕。受此影響，大稻埕張家女婢剪絨（14歲），於1900年3月1日成為第一位放足的女性¹⁰。

在民間推行「解纏足」運動，不僅在北部有以黃玉階為首的推動；在中部也有以霧峰林獻堂為核心在推展¹¹。

由於臺灣仕紳紛紛成立解放纏足的組織與大會；以及總督府鼓勵與支持，這使得臺灣各地的放足運動遂順利而熱烈的推展。

就「斷髮剪辮」方面而言，在北部由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謝汝全與大稻埕區長黃玉階，於1911年2月11日，共同發起民間『斷髮不改裝會』。該會以辮髮不合時潮、不衛生、不方便，且礙於同化，故須剪除，不過對於改穿洋服則不贊同。另外在1912年3月3日，萬華龍山寺也舉行斷髮會¹²。

在中部霧峰林獻堂於1911年4月1日斷髮，隨後在1911年4月3日，林獻堂等人召開「台灣中部剪辮會第一次會議」，推廣男性剪除辮子¹³。

在隔年的1912年4月13日，林獻堂等發起成立中部剪髮會，在台中公學校內實行第一次剪髮¹⁴。到了在1914

年10月霧峰林家更盛大的舉行「放足運動與剪辮運動」¹⁵。

自此開始民間組織性斷髮運動便在全省各地熱烈展開，期間雖有部份人是持反對態度加以抵抗，但不影響整個運動的推展，故在短短時日臺灣社會中，上流階層及學生大都斷髮。對於斷髮運動能快速獲得響應，除了透過法令的禁止之外，另有兩項原因，其一是當時臺灣社會將斷髮之舉視為是順應時勢所趨，不但象徵是一種文明進步之舉；也是一種對現代化認同的表現。其二是，當時臺灣民衆藉由斷髮之勢來表達心向祖國的心意（即受到1910年之際，中國大陸因受到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影響之刺激，而更加促使剪辮風氣的盛行）。（圖5、圖6）

四、台灣服飾變遷受「文化體系」影響之分析

在1896年日本總督府設立「國語學校傳習所」，這也開啓了台灣人接受日本政體的教育制度。

到了西元1898年7月28日，當時殖民政府，更以【第一七八號命令】

10 楊碧川（編著），台灣歷史辭典，台北：前衛，1997，頁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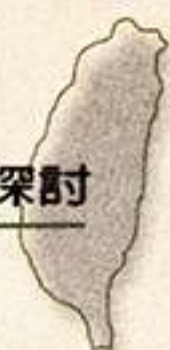
11 賴志彰（編著），台灣霧峰林家留真集，台北：自立報系文化，1989，頁286。

12 同註六，頁183。

13 同註十一，頁280。

14 同註十二，同頁。

15 同註十三，頁313。



公佈公學校令，將「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自此臺灣的國民教育才正式的開始。由於當時台灣子弟就讀仍以中式書房為主；加上「公學校」對學生服飾並無規定，這也使得孩童的服飾，能持續維繫中式款式的樣式，得以穩定。

但是在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台人見日本強大，意識到台灣歸還中國的希望渺茫，乃願接受日式教育，而公學校在台灣總督府公權力的大力推動下，其校舍建築及有關設備亦見充實¹⁶；加上日本政權已趨於穩定，這使得台灣子弟就讀公學校逐漸增加。不過當時「公學校」學生上學服飾仍是中式款式。

然而台灣子弟上學穿著中式款式服飾的情形，在1915年之後卻開始有了顯著的改變。其起因是由於在1915年，台灣總督府於台中設立了第一所公立中學校，學校規定學生舉凡食衣住行皆採日式，故該校學生依據日本制度，制訂男學生制服款式，即「日式西化的制服」（例如，立領、西式鈕釦）。至於在1910年代的女子中學的女學生，則仍著平日所穿的中式服飾（不過在1910年代後期，女生裙子款式為『西式裙』；著西式皮鞋，故應為中西合併）。

而值得一提的是，中等學校實行穿著專屬的學生制服比公學校要早（公學校因無規定學生的穿著，所以在1910年代，男女學生上學仍著平日所穿的中式服飾）。

從以上的討論與分析我們可得知，「文化體系」中的「教育因素」，其對台灣學生孩童服飾變遷所帶來差別性的影響是相當的顯著。

貳、「日據中期的同化時期」 （1919年~1937年）之論述

一、台灣服飾變遷受「政治體系」 影響之分析

日本治台之初，因有鑑於殖民政權尚未鞏固，加上臺灣居民武裝抵抗激烈，故對臺灣居民的舊習均採取放任策略，甚至被總督府視為臺灣社會三大陋習（『吸食鴉片』、『辮髮』、『纏足』）也抱持著不干涉的態度。

然而這種不干涉態度，到了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上台後，便轉為以限制作為政策的原則。只不過是這種「限制政策」仍屬漸禁的方式。除此之外，在當時的輿論界還出現「移風易俗」策略的評論，即求促總督府頒佈斷髮、解纏、著日服之令，以達遵從日本風俗，接受日化之目的。

16 鄭梅淑，日據時期台灣公學校之研究，頁22。

到了第八任田健治郎就任台灣總督之後（在職期間：1919年10月29日～1923年9月2日），他則更加積極地朝向「同化政策」方向邁進。在1919年10月12日，田健治郎於總督府會議室召集府內薦任以上高等及臺北各機關首長，發表其施政方針；以及在1919年10月29日發表的就任宣言，又再次明確宣示將台灣導向「同化」的政策方向。

雖然說此階段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的施政方針以「同化政策」為主，要求臺灣居民積極接受同化，但其實日本並未給臺灣人有同等的權利與待遇，而是要求臺灣人學習日本語言、文化、習慣；並放棄漢族意識與文化。

同樣的，為了達到這種實質「日化」（去中國化）的目的，日本殖民政府更藉「西化」為包裝，使得台灣民衆的服飾，產生極大的轉變。而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原則就是，台灣居民「快速而普遍的穿著西式，以取代中式的款式」；「接受日式款式的服飾」。

二、台灣服飾變遷受「經濟體系」影響之分析

由於台灣不適用於棉花的種植，所以台灣在棉紡織工業發展較為遲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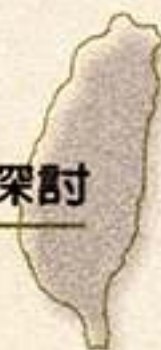
第一世界大戰末期，遠東地區各地棉布市場，供不應求，促成日本紡織工業積極發展。正因為當時所有產品儘量運銷中國大陸及南洋各地，無力供應台灣的需要，於是乃有台灣織布株式會社的創設，該會社即今工礦公司新豐紡織廠的前身，於1919年開始籌備，到1921年6月開工，是台灣第一所動力織布廠¹⁷。

不過，其實這段時期台灣的紡織工業並未受重視，此階段仍舊如同前一個階段，台灣所需的織品布料，仍舊需要仰賴日本或中國大陸海外的進口。當然這也造成易於接受外來的服飾文化。即更容易接受日本（或來自日本間接的西化）、中國大陸流行服飾款式的影響。

三、台灣服飾變遷受「社會體系」影響之分析

在此階段有關社會事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項由台灣人自己所發起的民間性社會運動，其最主要的宗旨是希望能強調台灣的特殊性，而反對當時日本內地延長主義的主張。即是主張台灣民衆的一種「民族自覺」運動。當然這項社會運動與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積極推行的「同化政策」正好互為衝突，而造成日本執政者極度的恐慌，

¹⁷ 同註九，同頁。



最後在1934年9月2日並將此團體強制停止¹⁸。

無疑的，這種強調自主性的「社會運動」，確實大大地將台灣住民的民族意識加以凝聚合一，並使得台灣民衆在民族信仰上，有一個明確而清楚的共同目標。而這種「強調台灣民衆的自覺」，也著實地反映在台灣民衆「自我形象概念」的確立。即當在面對自我穿著的態度時，不再只是一昧受日本執政當局的牽引而盲目的跟從。換而言之，就是激起「以自我民族爲中心的穿著意識」，並藉此有效地減緩當時日本積極在台灣推展「日化」與「去中國化」的發展，以能保留住中式服飾的存在（這也說明了，例如在1930年旗袍款式之所以仍能在台灣普遍流行的原因）。故這項社會運動對台灣民衆，保有自主性的穿著，而免於快速日化，是深具意義的。

四、台灣服飾變遷受「文化體系」影響之分析

其實此階段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所推行的「同化政策」施政方針，並未給臺灣人有同等的權利與待遇，而是要求臺灣人學習日本語言、文化，放棄漢族意識與文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國民革命

成功所帶來的激盪；中國五四運動發展的刺激；世界思潮的衝擊；以及臺灣知識份子吸收西方思維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使得臺灣居民對自我前途產生了一種文化自覺。就在此條件上，直接喚起了台籍菁英份子，對自身文化形成一種自覺的意識，而發展出臺灣首次的文化運動，稱之爲「新文化運動」。

對於這種以文化自覺爲基礎的「新文化運動」，其實在中心思想也同時形成出兩種心節的糾葛；即一方面，對傳統提出批判、質疑，以求得「進步」、「適應」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卻又希望藉維護部份中國傳統文化，來作爲抵抗日本同化的憑藉，而對傳統文化有所保留。以下研究者就將其歸爲三大派別來加以分析：

1、「排除傳統派」

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鼓吹進化新思潮，努力把觀念傳播於一般民衆，即是希望激起民衆的思想啓蒙；並藉由進化的觀點，以促進民衆在行爲模式上有不同於舊社會的外觀。這不僅代表進步，也代表希望，有鼓舞社會進化邁向現代化與擺脫落伍的象徵。而這種觀點，也被用來藉以討論服飾的問題。例如，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言論報【臺灣民報

¹⁸ 同註十，頁285。



▲ 1935年女性穿著當時流行的旗袍。〔本圖由黃文玲提供〕圖 7

】中，一篇由黃周所寫的【換新衣裳】內容，我們就看到他對傳統中式服所做的批判：

「生於現代的人人，絕不能拒絕否認社會進化的事實。然一班舊人，以墨守古制為理想，盲從典型為美德，誤認傳統舊慣為絕對真理。這種迷信，非由根本上改革不可。那班舊人所穿的是一件舊衣服，只合他們穿用。我們生活在新時代的人人，自有我們應穿的新衣服，焉得認穿其舊套呢¹⁹？」

「若是依然因襲祖父傳來的舊套

，則我們社會就不能進步，而永遠居於人後了²⁰。」

從黃周這篇文章進一步探究，我們可看出這一篇雖然是以穿衣為喻，但卻是從進步和適應的觀點來加以闡述揚棄傳統的重要，故對不合乎時代要求的裝扮，也會在革新浪聲之中漸被破除，並再賦予新風貌。

由此可知，臺灣民衆當時在面對外來新審美觀的輸入時，也是因為正處於時代轉換，其一切制度均在革新的風氣之下，而有改變的條件，因此對西式服飾的接受力呈現出良好吸收

19 葉立誠，台灣服裝史，台北：商鼎，2001，頁78。

20 同前註，同頁。



▲1931年新娘著旗袍、頭戴白紗、腳上穿西式鞋；新郎著全套西裝禮服、手拿手套。
〔本圖由張國萬提供〕圖 8

能力。

2、「維持傳統派」

除了從上述看出，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所提出的批判之外，其實新文化運動爲了對日化現象給予抵制，而融入了一些傳統文化，故也因而終衍生出一種屬於臺灣人所特有的文化。即藉由維護部份中國傳統文化，來作爲抵抗日本同化的憑藉，而對傳統文化有所保留。例如，黃呈聰就撰寫【應該著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一文

，公開反對日本文化同化政策。他明白指出：

「臺灣自割讓以來，移入日本的文化特質很多。過去臺灣當局採用同化的方針要將日本物質文化移植於臺灣，對於各地極力獎勵，如交通的整備、衛生的設施、產業的開發、這是有益於民眾生活，我也是很贊成的。但是向日本式地名的改正、國語的強制、日本式衣食住的獎勵、漢文的限制、學術研究的束縛等……這是不利於民眾的生活，阻礙文化的進展了。凡文化是要順其自然的普遍性，不是可以政策來強制的東西，倘使不適合民眾的實生活，雖是強制，結局是難得達其目的，此徵於過去的史蹟可以明白的²¹。」

其實這種對漢人固有文化存亡的關懷，也被當作反對抵抗日本文化同化的重要憑藉，而這也使得當時台灣服飾的發展，能在強大的「西化」或是「日式西化」之下，仍相當程度維持「中式款式」的重要因素。

3、「調和派」

在文化民族主義的影響下，新文化運動人士對傳統中國文化有相當的情感依戀，加上爲對抗日人的文化同化主義，對固有文化勢必不致輕言放

²¹ 同前註，頁83-84。

棄，再加上新文化運動以創造「臺灣特種文化」為目標的自覺，故對批判傳統引進新思想以提昇文化水準之際，自然不易發展出全面反傳統的態度。即是強調吸收世界文化並融入傳統固有文化，而發展出具一套自我文化特色。

這種看法的代表，例如於前文曾提及的《應該著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一文中，黃呈聰於該文之後，繼續在「吸收外來優秀文化和固有文化的調和」的基礎下，提出「創造臺灣特種文化」的論點：

「這特種文化是適合臺灣自然的環境，如地勢、氣候、風土、人口、產業、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等...不是盲目的可以模仿高等的文化，能創造建設特種的文化始能發揮臺灣的特性，促使社會的文化向上²²。」

從上述「調和派」的引述可知，新文化運動推動者為引進新思潮創造新文化，對傳統雖加以批判拒斥，但其態度一般較為溫和，反傳統的型態是部份的、選擇性的、非盲目的。當然，這種思考模式不但提供了新文化運動在推行上有所依據，也為當時服飾所出現之多元化的複雜性，奠定了

包容與接受的基礎。

縱觀新文化運動時期，從1920年到1932年這十多年的發展，這長達數十年的發展運作，無疑的對臺灣的思想價值確實造成極深遠的影響。例如我們從留存至今的傳世老照片看出，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成人男性的穿著以「中式服」、「西式服」與「中西和璧」三種款是為主。對於這種衣飾文化所呈現的「異質性組合」，正好表現出東西文化在衝擊之下過渡的反映。

當然在1920、30年代由臺灣本土菁英為主所推行的「新文化運動」。其形成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作為條件基礎。一方面受到日趨壓力的日化，再加上世界思潮啟蒙的影響，這都促使台籍知識份子在面對「日化」與「反日化」、「傳統」與「現代」、「新」與「舊」、「東方」與「西方」、「中國」與「臺灣」這些複雜問題之交匯衝擊下，而歸結出一套臺灣人對自身前途的文化自覺。(圖7)(圖8)

而且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以「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強調之「優勝劣敗」、「適應」和「進步」作違反傳統的理論基礎，此為服飾西化提供一處發展生機，但在另一方面，推動者

22 黃呈聰，應該著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台灣民報，卷3號1，大正十四年一月一日，頁7-8。



又基於藉重保留傳統文化，以作為抵抗日化的依據。此也讓中式傳統服飾有存在的條件。綜合而論，由於這種對傳統文化所採取的非全盤否定的立場，故而提供當時臺灣在衣飾文化的發展，能共容「中式」、「西式」、「中西合璧」等三種不同款式的空間。同樣這對當時雖然是處在日本執政的局面，於政策上又積極推展日化的情形之下，但卻未造成臺灣的服飾普遍形成日化現象，新文化運動對服飾文化發展可以說扮演著很重要的影響角色。

此階段在「文化體系方面」，除了受到「新文化運動」對台灣服飾變遷帶來重大影響之外；另外受到「教育制度發展的變易」，也同樣深切的影響台灣學生與年輕人在當時（以及日後）服裝意識態度的建立。

從一九二〇年代中期開始之後，公學校的男生開始著「日式西化」的學生服。中學校女生也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穿著「日式西化」的學生服。這種全面一改之前以「台灣服」為學生制服的情形，其起因是由於，明石元二郎從1919年開始，他針對台灣教育提出重大變革。例如，在1919年公布『臺灣教育令』的實施²³。在1922

年2月6日修正『台灣教育令』，除了普通學校、公學校之外，所有學校依據日本內地學制實施；以及在1922年4月1日實施「日台共學制」²⁴。自此開始，不但確立了臺灣教育的根本方針，也統一了臺灣的學制。當然，在此基礎之下，全體學生的制服模式也因而形成。換而言之，在台灣學生制服方面，不論是衣服、鞋子、帽子、書包等都有一定的式樣，並且以日本為本。

此說穿了，就是日本殖民政府，希望透過日式教育，使得台灣年輕學子「同化」成為日本人，即藉由教育方式欲圖達到，「消滅臺人固有文化的信仰，並建立起具有大和文化意識的新世代子民」。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學生制服更趨於完備，一切均以日本為本（即都是『日式西化』的學生服），至於中式學生服的情形則已不覆見。

當然受此影響，年輕學子在透過學校的日式教育，以及形貌制服的「日式西化」洗禮下，確實對台灣年輕子弟「去中國化意識」的建立，帶來深厚而直接的影響，此也因而造成年輕人更樂於普遍地接受「西式服」的發展。

23 七十級畢業委員會（編著），繼往開來，台北：實踐家專服裝設計科，1981，頁267。

24 遠流台灣館（編著），台灣歷史年表，台北：遠流，2001，頁15。

參、「日據後期的皇民化時期」（1937年~1945年）之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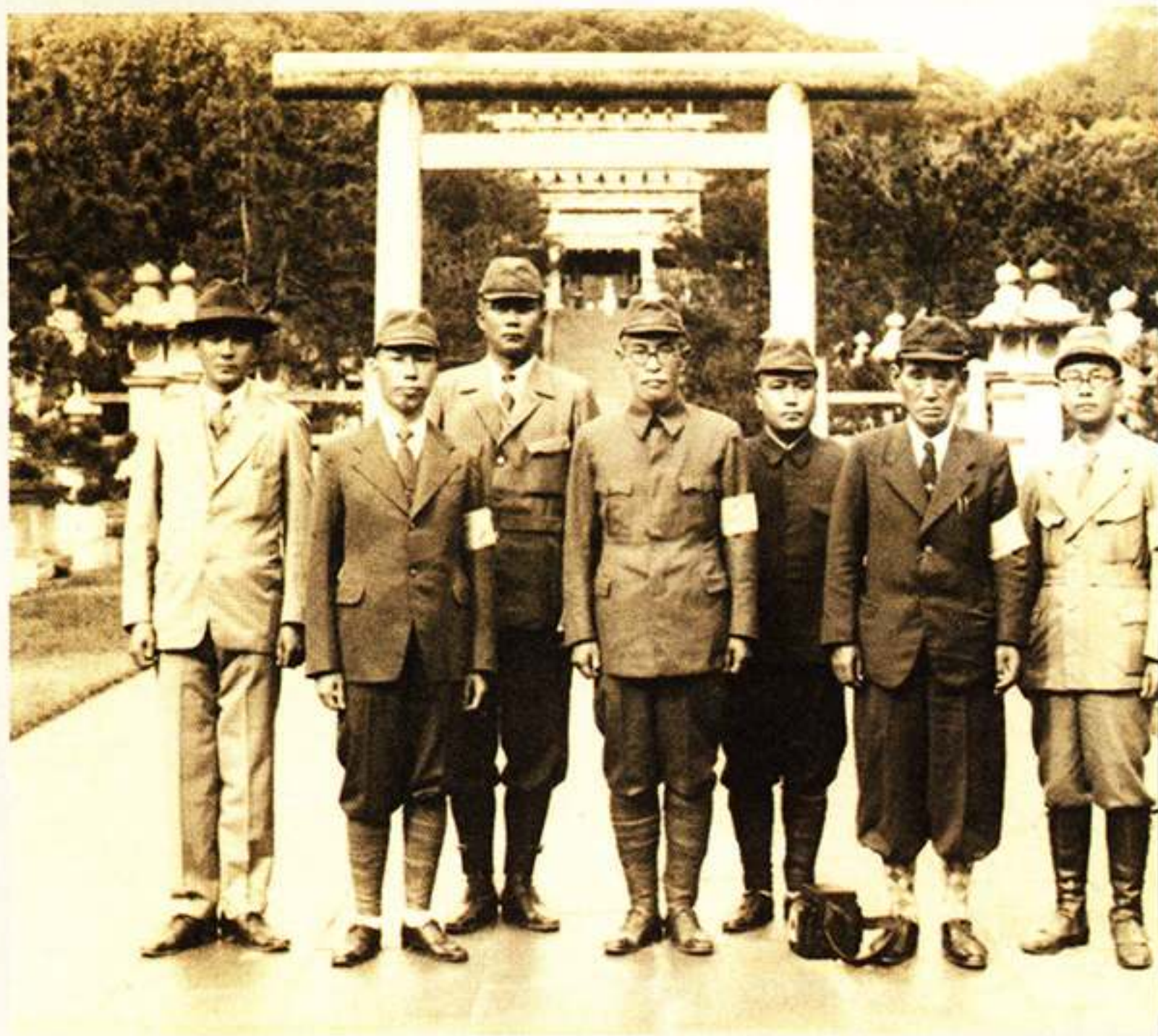
一、台灣服飾變遷受「政治體系」影響之分析

日本殖民政府始自1937年開始便一改之前的「同化主義殖民政策」，而採取「皇民化殖民政策」。基本上，臺灣殖民政府在「同化政策時期」（1919年~1937年），其方針是「教育同化、經濟同化、但是政治不同化」作為目標。然而在「皇民化政策時期」（1937年~1945年），則是以更積極性、強迫性、全面性的高壓同化政策，以達台籍居民效忠日本來作為目的。

有關「皇民化運動」，之所以成為日本殖民政府對

台殖民的政策方針，其起因要追溯自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進入戰時體制，對臺灣的漢民族懷有極深的恐懼感，為「拉開臺灣與中國關係而能與日本結合，以穩定殖民秩序」之目標，於是展開「皇民化運動」如此才有臺灣總督小林躋造在1939年5月19日發表以「工業化、皇民化與南進基地化」作為政治口號²⁵。

至於何謂「皇民化精神」？我們



▲ 1940 年皇民化時期出現台灣男士著日式軍服的情形。〔本圖由顏施家族提供〕圖 9

根據日人江間常吉於其所著的《皇民化運動》一書中，清楚瞭解到日本殖民政府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理念：

「所謂皇民化則是針對皇國領有的新皇土之人民，皇國對於成為新皇民的人們，以肇國之大義，在領有的同時，就要使“大御寶”的民眾，同化到與有史以來的國民完全沒有差別為止。這是天皇愛民的顯現。因此，皇

²⁵ 同前註，頁18。



▲ 1941年受皇民化影響，女性著日式改良服；男性著國民服。〔本圖由陳玉音提供〕圖10

民化是針對新成為皇民之民眾。不久支那四億之民也將同浴皇化，東洋將成為東洋民族永久理想鄉，但這四億之民無法成為皇民。新附之民一躍而得以成為皇民，應該儘速透過皇國的國史，知曉肇國之大義，體會皇道精神，自己掃除向來的生活樣式，舊慣

、發起自發的運動，徹頭徹尾同化為皇國民。這運動稱為：皇民化運動²⁶。」

故而言之，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是要以高壓的思想控制，來求臺灣人從外表到內心徹底變為日本人，以求利於其奴化政策的推行作為目的。

為了有效推展日本化，日本殖民政府也從1937年開始實施「國語家庭」制度。而所謂「國語家庭」其條件首先是要全家人都使用日語（未滿四歲及十六歲以上者除外），並且過著「皇民化」生活，內容包括奉祀神公大麻（拜日本天皇先天照大神）、改善廳堂（廢棄傳統信仰）、改穿和服或國民服。

除了有「國語家庭」制度的實施，另外日本殖民政府也成立推行教化運動的機構，其中對服飾的改善，也出現風俗同化的組織，要求臺灣民眾改良服飾，並且獎勵穿和服、國民服。這直接促使了在1940年2月由「國民精神總動員」台北州支部發起的「本島婦女服的改善運動」。其宗旨明確指出：

「……本次事變（二次大戰）為契機，本島的皇民化運動，有顯著的高昂趨勢。因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實施

²⁶ 同註二二，頁99-100。

，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不拔的精神振作，有更加熱烈而強有力之感。皇民化運動旨意為要求所有的本島人（閩、粵）培養物心全面的皇民意識。過去他們穿中式服裝的生活中，不知不覺養成了其原本的國民意識及感情，這種現象與皇民化運動是不相容的，因而有必要加以適當的指導。本島男人穿著的中式服裝的鈕扣，經過州（縣府）的指導，已從傳統布製的鈕扣，但女人的服裝遲久不改，尤其中年以上的婦女還一直保留傳統而無意改善。這種情形，實在與皇民化運動的施行背道而馳²⁷。．．．」

為了實行政策，有關單位首先調查了臺灣婦女們對改善運動的意見，並舉納出六項建議如下：

- （1）保留衣服的右開襟（即鈕釦在右側邊的大襟）。
- （2）衣服的長度要長。
- （3）不要套頭式。
- （4）袖子寬度可以改窄，但領口不要開太大。
- （5）袖子要保持寬大。
- （6）本省傳統服的裁剪簡單，不必使用紙型即可直接裁剪，用料也很節省，只需衣長的兩倍。希望這點能被納入考慮。

結果有關單位，把傳統服修改為中西合併的服式，並規定新製的衣服式樣如下：

- （1）長衫：原有的長度改短15~20公分，開叉處加上一塊打三個摺的襠布；豎式領子改為摺平式的西式領、腰上要繫一條腰帶。
- （2）短衫：衣身的寬大叫縮小，長度改短，豎式領子改為西式的摺平式領子。
- （3）工作服：規定長、短兩種褲裝，上衣則為西式連袖短襯衫。

此外，日本殖民政府也規定戰時簡便的男女服式，男用服有國民服甲、乙兩種，均係軍服型態，女用服則為短上衣配燈籠褲等²⁸。

從上述可知，日本殖民政府相信服飾的改變不僅是在外表上達到皇民化，甚至可透過穿著日式衣服培養日本國民的意識。因此，一方面要臺灣人放棄傳統服式，擺脫與中國文化之關係，一方面鼓勵臺灣人穿和服或西式服裝。

另外，隨著中日戰爭的開始，日本殖民當局也展開徵召台灣青年充當軍夫的政策。在當時這些受徵召入伍，充當日本軍夫的台灣青年，他們皆著日軍服，此對台灣服飾的現象，無

²⁷ 林成子，六堆客家傳統衣飾的探討，實踐家專，1981，頁111。

²⁸ 同前註，頁111-112。



疑的確實是帶來極大的改變。(圖9)

綜合而言，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在日據後期施政時，爲了有利於其殖民臺灣的目的，所推行的風俗習慣皇民化改革運動，在服飾方面，也曾要求臺灣人放棄原有服飾，並鼓勵改穿具有日本同化符號象徵的和服與國民服，以培養日本國民之精神；除此之外，在皇民化中實施徵調台灣男士當兵的政策，並讓這些台灣男士穿著日式軍服，也更加深台灣男士日化的發展。當然以上種種都說明了，日本在殖民臺灣時期，其欲圖運用「計畫性政治力」來促成服飾文化改變的事實。

二、台灣服飾變遷受「經濟體系」影響之分析

在戰時日本的經濟體制，主要是爲了適應戰事發展，因而採行戰時經濟體制，而台灣自不例外。首先在1938年4月，日本公佈國家總動員法，制定生產力擴充計劃與物資動員計劃，全面擴增日本及其所佔我國東北與台灣等地的生產力，以滿足戰時日軍所需²⁹。

在日治時代，想要在台灣開設織布工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時，

日本政府不但不給予扶持，反而多方阻礙。當時工廠經營困難的情形，我們可從工廠增加的數量上得到說明：從1920年到1945年約二十年間，台灣動力織布廠的增加數量，不過十三家，平均一年增加不到一家。由於日治時期對台灣紡織工業的抑制，所以台灣紡織工業在整個工業生產中，地位並不重要³⁰。

雖然說，日本殖民政府爲擴大其軍事侵略，而全力擴增生產，這使得台灣工業生產總值從1937年的3.6億台圓，增至1941年6.6億台圓，增加81.4%，較戰前(1932-36)的37.2%成長率高出2.2倍³¹。不過相較之下的民生消費的發展則是受抑止的。例如，在1940年7月30日總督府就實施「奢侈品等製造販賣限制規則³²」。由於台灣民衆在戰時生活是相當拮据清苦的，這也使得服飾發展受經濟因素的影響，而較前階段時期更顯得簡樸。

三、台灣服飾變遷受「社會體系」影響之分析

事實上，「皇民化」就對新附領土的台灣居民，從物與心兩面，徹底

29 同註八，頁84。

30 同註十七，頁12。

31 周憲文，台灣經濟史，頁524-525。

32 同註十四，頁261。

去除從前的思想信仰物質等狀態，而使得台灣完完全全成為日本皇國的土地與居民。因此，要求成為皇民的台灣人民，應自動地發起，更改以往生活方式與舊有風俗習慣³³。

就社會的層面而言，日本在「皇民化政策」上具體的措施，包括廢止報紙漢文欄、中止台語廣播、強制推廣日語、更改姓名、燒燬祖先牌位、奉祀神宮大麻、廢毀寺廟、建造神社、遙拜皇居、禁過舊曆新年、禁演台灣戲劇（如布袋戲與歌仔戲）、至初等教育義務化、日語常用強化、習俗日本化（如穿木屐和服及使用榻榻米）等，範圍相當廣泛³⁴。說穿了，這些措施均是強迫台灣人民，在生活方式上放棄漢民族固有的傳統，而一切社會活動均以日本模式為準。即是讓全體台灣民眾的生活模式，培育出一套深具日化的「社會意識」與「社會價值」。

受此影響，使得台灣民眾更自然而普遍地接受日式服飾（例如，日式木屐的普遍）；或是放棄中式的服飾（例如，著旗袍、台灣衫、長袍馬褂的人數相對減少）。

四、台灣服飾變遷受「文化體系」影響之分析

自第十七任小林躋造至十九任安藤利吉，約九年時間。因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國力消耗過鉅，需要臺灣人民全面協助，故由同化政策跨前一步，推行「皇民化運動」，強迫臺灣人民，在生活方式上放棄漢民族固有的傳統，常用日語，改用日式姓名，衣食住完全日化，以支持日本當局³⁵。

無疑的，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中，他們強迫臺灣籍居民廢除中式傳統服式而鼓勵穿著和服、國民服可知其用意，是期望藉由外在穿著來培養內在的日本國民意識。（圖10）

至於在「文化體系」中扮演相當重要地位的教育，在日據末期（1937-45），殖民政府對台灣初等教育制度有兩項改革，首先是在1941年3月修改台灣教育令，與日本本土同步實行國民學校令，並依該令將台灣所有小學校與公學校改稱國民學校³⁶。並在1941年4月1日正式廢除小學校、公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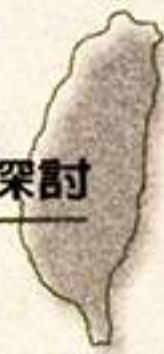
33 戚嘉林，台灣史，自印，1998，頁1612。

34 程大學（譯），皇民化政策與民俗台灣，台灣文獻，32(2)，頁72。

35 同註三，頁287。

36 何義麟，皇民化時期之學校教育，台灣風物，36(4)，頁49。

37 註二五，同頁。



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解釋當時實施國民教育的原因係「鑑於皇國在東亞及世界的地位與使命，必須確立獨自的教育體制，此教育體制的目地在於統合以往的教材，使修鍊皇國之道歸一，以培養國民之基礎，從而扶翼皇運，培育下一代的大國民³⁸」。

當然在此基礎下，台灣學生制服完全地接受「日式西化」的款式，其不論是衣服、鞋子、帽子、書包等，一切式樣都以日本為本，而日本殖民政府期望透過教育方式，來達到「去中國化」的企圖，也可以說完全得到落實。

肆、「1945年~1959年」之論述

一、台灣服飾變遷受「政治體系」

影響之分析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接受「波茨坦宣言」，並透過廣播，宣佈無條件投降。同年10月17日上午11時，首批國民政府軍隊抵達基隆港。緊接在10月25日上午，於台北市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緊接，受降官宣佈：「臺灣、澎湖正式重入我國版圖，一切主權重歸中華民國政府。」至此，臺灣地區總算正式結束了自1895年以來，長達五

十年又四個月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局面，而重回中華民國的版圖之中。

就政治的角度，我們可以將臺灣光復的1945年到1959年，分為二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45年臺灣光復~1949年國民中央政府撤退來台之前。

第二階段是1949年國民中央政府撤退來台~1959年。

在第一個階段，對臺灣居民而言，這是個極具轉折的四年，首先臺灣民衆所面對的是政體的轉移；以及面臨的是一個新的、未知的時代之到來。雖然在當時因政權的轉移，局勢出現了真空狀態，不過全省的臺灣民衆，對於回歸祖國仍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甚至有許多臺灣女性，在物質嚴重缺乏條件之下，仍然把嫁妝衣服修改成旗袍，以表達對祖國的認同。然而到了1947年在震驚臺灣的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本省籍」與「外省籍」造成對立情結，形成省籍間的鴻溝，這也使得臺灣婦女穿著旗袍情形，頓時減少許多。

台灣在重回中國政權之後，中央國民政府也相當在意之前日本殖民所留下來的「日本遺風」，希望透過政治力將所遺留下的日本文化習慣予以

³⁸ 同註三六，同頁。

革除與取締，以能快速「去日本化」並回復「中國化」。同樣的，這種想法也反映在服飾的項目之中。其最具代表就是在1946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當局申令禁止學生在校穿木屐³⁹。

在第二階段，由於1949年國民政府因大陸的失守、淪陷而播遷來台。旋即在12月9日之時，中央行政院也遷徙到台北辦公，自此臺灣就正式進入到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而隨國民政府，自中國大陸各省來台定居的「新移民」高達150萬人以上。此與先前移民的「老移民」成1：4的比例。由於這種人口結構的改變，直接影響臺灣地區服飾的發展，扭轉了臺灣地區稍早的服飾形制。這種轉變首先是大批國軍的來台（約50萬的國軍官兵），所以處處可看到著軍服的現象，而且此種情況也持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當然所謂的「外省人」著軍服的情形，與所謂的「本省籍」男士平時所穿著的「日式木屐」，似乎形成有趣的對比。此也看出「本省籍」受日式文化影響的遺風之所在。

女裝部份，雖然臺灣於30年代曾流行過「旗袍」，光復初也曾再度盛行過，然到了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由於大陸婦女普遍著「旗袍」，這使得

「旗袍」在臺灣又再度成為第三次的流行。

此階段，除了「旗袍」是主要、普遍的女裝之外，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女性也帶來另一種款式的風行，那就是「大衣型長外套」，這也是過去臺灣女性服飾較少見的。另外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各省女性由於是逃難，故一般婦女在服飾穿著上就不如臺灣女性穿著那般體面。這也使得台灣地區女性服飾出現「本省籍」與「外省籍」的差異。

另外，在1949年5月19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公佈臺灣戒嚴令（翌日起全省戒嚴）之外；再加上在1952年1月1日總統蔣中正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號召推行經濟、文化、社會、政治四大改造，完成反共抗俄總動員⁴⁰。以及在1953年1月1日總統蔣中正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要求全國軍民繼續反共抗俄總動員，發揚新、速、實、簡作風，完成反共復國準備⁴¹。

這使得台灣民衆生活的「自由開放度」受到限制。同樣的，民衆服飾在穿著打扮上也因而受到思想價值的牽制，呈現較為保守單一而不敢放縱的態度。故這也顯示出，當時「政治

39 中國時報（編著），台灣：戰後50年，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22。

40 同註三二，頁334。

41 同前註，頁347。



意識」對服飾發展所帶來深厚的影響。

再則，由於美國為台灣的盟邦，在中共威脅台灣之際，美國更派軍員協防台灣，當時也有許多的美軍與眷屬來台定居，受此影響這使得台灣深受美式文化的感染。

二、台灣服飾變遷受「經濟體系」影響之分析

從1945年到1950年之間，台灣的經濟狀況可以說是一片混亂，在這段期間由於國、其內戰及國民政府遷臺，造成數百萬軍民湧入臺灣，資源分配一時無法適應現實的需要，1948年通貨膨脹高達1,145%⁴²，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不到100美元⁴³。故大部份的家庭尚停留在追逐溫飽的階段。

在光復之後的台灣紡織業，逐漸蓬勃的發展。首先是國民政府接收日本留下的七家紡織公司（日本曾在臺設立有近十家的紡織公司），集中編入「臺灣工礦公司」。爾後在1948年上海紡織業大舉移入，為臺灣紡織界帶來新機（1949年政府遷臺，大部分

的紡織廠如大奏、雍興及申一也跟著遷來臺北，加上新設工廠，使紡錠增至五萬餘枚，織布機二十餘台，年產棉紗一萬六十餘件，棉布四千三百萬平方碼，奠定臺灣紡織工業發展的基礎⁴⁴）。

除此之外，美國對國內的紡織業也給予很大的幫助，從1951年美國經濟合作總署宣佈對台提供「經濟援台計劃」，到1965年間，美國對臺灣的經濟援助，都直接提供我國紡織業在技術、設備和原料的需求，協助臺灣紡織工業的發展；在另一方面，政府在美國的援助下，視紡織工業為重點基礎工業。從1950年11月，政府執行「代紡代織政策」，鼓勵民間發展紡織工業，奠下我國紡織品外銷基礎⁴⁵。

到了1953~1956年政府推行的四年生產建設計劃，更以紡織為其中重點工業項目之一。在1953年第一個四年經建計畫展開，「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紡織業是其中的重點工業⁴⁶。

42 天下雜誌編輯，一起走過從前，台北：天下雜誌，1944，頁203。

43 同前註，頁204。

44 同註二三，頁55。

45 何飛鵬（編著），台灣經濟影像，台北：卓越文化，1987，頁63。

46 同前註，頁77。



▲ 1958年時台灣家人的合照。

〔本圖為研究者個人收藏〕圖11

由於紡織品外銷的成功，不僅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也連帶提昇了國內製衣業成衣品的技術，當然這對臺灣民衆在衣著的改善，是有其絕對而正面的影響。

從台灣紡織業的萌芽到當成工業發展的重點，我們不僅看到台灣受到美國所帶來援助的影響；我們也看到國內民間，在政府經濟政策的影響之下，以紡織業作為提振經濟發展的配合。由於在1950年代的臺灣，經濟條件逐漸轉好的發展，這也使得臺灣民衆的穿著漸漸地較有餘力來重視服飾，而且能更完整地接受西方流行服飾的樣式。

三、台灣服飾變遷受「社會體系」影響之分析

雖然說台灣經濟發展到了1950年代，已漸漸有所氣色，而且逐年快速

的改善與成長。不過由於是才剛轉好的情況，貧富差距也很大（1953年貧富差距高達20倍），政府希望一切能穩定踏實，加上當時有海外中共軍勢的威脅，以及國內戒嚴時期環境等因素考量。所以在國內社會推展「克難勤儉」、「避免奢華」的觀念。即藉由這種「社會力」來減少國民浪費式的消費，以提高生產的目的。

基於這種信念，當時不論是軍中、社會、學校、公家機構，所有的社會單位團體，都紛紛制訂辦法，全力配合。已研究者的評價，我個人也認為這無疑是一場「社會革新運動」。在這場「社會革新運動」，其中最具體代表的策施，就是在1950年6月12日，由內政部所草擬的「公務員開始實行布衣布鞋運動」。

四、台灣服飾變遷受「文化體系」影響之分析

此時在文化方面，可以說是「摒棄殖民文化與文化防衛時期」，其最主要的二項重心：其一，加強台灣民衆建立「中國文化」的意識；並快速去除台灣民衆的「日本文化」意識。其二，建立「新生活運動」。

在剷除台灣民衆的「日本文化」意識，我們從當時政府對日本刊物的抑止，而被美國英文版服裝雜誌；以及香港來台的電影雜誌（其內容不僅



是電影方面的資料，同樣的也多有談論服飾流行的訊息）所取代。此奠定了往後台灣流行文化朝「美式」與「港式」學習的基礎。（圖11）

至於在建立「新生活運動」方面。從1947年2月18日台灣開始實施「新生活運動」⁴⁷。此運動也與國內社會所推展「克難勤儉」、「避免奢華」的觀念相互結合。這更使得1950年代的台灣社會文化，形成出一種具「新生活」的「社會文化革新運動」。

受此影響於學生服儀方面，在1952年2月17日，省教育廳就通令中學生「蓄髮男士不超過三分；女生留短髮，長度不過耳際」的規定⁴⁸。

這種藉由服儀規範的要求，使得學生養成具有規規矩矩的「新生活精神」，以達到精神層面的改變，即是期望以透過教育的方式來教化學生（中學生這種髮禁規定，直到1980年代才正式完全解除）。

此清楚反映出學生服儀規範，在不同時代的教育文化目標之下，出現深具時代意義的變遷。

伍、「1960年~1969年」之論述

一、台灣服飾變遷受「政治體系」影響之分析

如果說1950年代的臺灣當時是處在一段筆路藍縷的歷程中，那1960年代臺灣的整體發展，就要算開始步入到穩定成長的階段。

在內政方面，由於全國軍民一致效忠中央領導中心，這也使得中央主政者能更順暢的，帶領台灣全體居民朝向一致的政策目標前進。在國際政情方面，由於越戰延續1960年代，形成美、蘇兩極化的對抗，這也益加突顯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也由於有美國的大力支援下，這也使得台灣的生存得到保障。在內政趨於安定；國際安全得到適度的保障的條件下，政府可以全力的拼經濟，致力於經濟上的發展。

至於在台灣服飾，也就在這種整體政治環境的原則下，形成出「穩定中求發展」的狀況。

二、台灣服飾變遷受「經濟體系」影響之分析

這個時期台灣的經濟，是處於「經濟穩定期」的階段。其由於全民一致的努力，這使得臺灣在經濟發展上，有了良好的發展。

在1965年加工出口區的設立，由於有低廉的勞力資源，這也吸引了大

47 同註三九，頁29。

48 同前註，頁76。

量外資投入，而帶動臺灣國內市場的提昇。

1960年代是以出口貿易為導向，而美國及日本為我國兩個最大出口的貿易市場，國內生產有明顯的成長（1962年11月29日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台灣的生產指數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居第二位⁴⁹。不僅如此，貧富差距也較前拉近許多（在1953年貧富差距高達20倍，但到了1960年則縮短為5.3倍），而且在1965年台灣更首次出現「外貿出超」的情形⁵⁰。（在1965年1月2日，經濟部長楊繼曾表示，去年輸出約4億5000萬美元，為實施經濟建設計畫以來成就最大的一年⁵¹）。

以紡織品為例，臺灣成衣製造商提供「物美價廉」的成衣，再透過美國百貨業的連鎖店，將產品分銷到全國各地。在這國際分工的條件下，臺灣1960年代的紡織業成長極為迅速⁵²。而這種以低廉人力從事原料加工後再出口的模式，使得臺灣勞工得到充分就業，國民所得及個人所得不但提高許多，根據數次工商普查的資料顯示，其中創造就業機會最多的是紡織與成衣兩項產業，佔總就業機會的

30.5%，紡織與成衣也是當時出口的最大宗產品⁵³。

也正因為人纖成衣在國內市場的活絡，故這也加速帶動了國內流行服飾市場的發展（由於成衣是大量生產，款式不僅較新穎、價格也較低廉，國人不再只有自製或訂做衣服，而是普遍地購買成衣。這都著實改變了國人購衣穿著的習慣）。

另外，此時國內經濟規模初具，各項政策在實施之後，堪見成效；至於在企業界，許多企業也適時成功地擴大工業產品的範圍。這些在經濟方面種種的成長發展，都直接地改善國人的消費價值觀；並且大大地提昇一般百姓的生活品質。當然這樣的轉變也連帶影響國人在衣飾消費能力的提高；加強了臺灣民眾對審美的需求，進而促使國人更加積極地追求衣著的時髦性與流行感。

綜觀1960年代臺灣衣飾文化的發展，在經濟因素的影響之下，擺脫了之前「簡樸、實用」的原則，轉而朝向「跟循西方流行文化」的方向前進（這不同於之前只是單純

49 同註四一，頁482。

50 時報文化編輯委員會（編著），珍藏20世紀台灣，台北：時報文化，2000，頁274。

51 同註四九，頁507。

52 彭懷恩，台灣政治變遷40年，台北：自立文化，頁94。

53 林忠正，光復前後兩個政府的經濟角色異同，歷史文化與台灣，台灣風物雜誌社，頁64。



的接受西化而已，而是更加重視對西方流行的追求，並縮短與西方流行時差的差距）。

三、台灣服飾變遷受「社會體系」影響之分析

由於國內經濟開始的蓬勃，民衆生活的提昇，這也連帶使得一些熱衷時髦、大膽前衛的年輕人，開始嘗試挑戰當時保守的社會。首先是「迷你裙」款式的挑戰。對於這種流行款式，雖在當時席捲臺灣造成風靡，但有趣的，同時在當時社會也出現一些反制現象，視女子裙子過短爲「奇裝異服」，並遭到警察的取締。

除了女性穿著迷你裙成爲六〇年代當時的流行，但卻又出現反制的現象之外，在男士髮型方面也出現同樣問題。那就是對臺灣男士蓄長髮的現象也會遭到取締。臺灣男士這股蓄長髮的風潮，是受到了美式「嬉皮流行風」的影響所致。然而這對當時仍屬嚴謹保守的社會體制與法規無疑是一種挑戰。故在當時社會對於男性留蓄長髮；穿著被視爲頹廢裝扮的「嬉皮風」是採取杜絕與取締的態度。

除了前述之外，在1960年代台灣社會另一項重點特色的發展，那就是「選美風潮」的盛行。由於到了1960年代，臺灣經濟逐漸穩定，國民所得的提高，生活改善，因此大家開始重視服儀外觀，故而從1960年6月5日於台北市開始由《大華晚報》主辦第一屆中國小姐選拔⁵⁴。緊接在1962年4月29日，也分別舉行「台中小姐」「高雄小姐」⁵⁵。

我們解讀這些選美活動的舉辦，可知它的意義不僅反映出臺灣生活水準的提昇，也呈現出當時國人對女性美的一種理想標準，特別是年輕女子對穿著、打扮，受此刺激而更加的重視；對審美中的「理想美」也有了一份憧憬、追求與期待。

由於社會這種選美風氣的大肆發展，也連帶影響服飾流行的發展。例如，在1962年11月29日，由青商會舉辦的髮型表演爲台灣首次，深受矚目⁵⁶。在1962年11月27日，台視電視公司舉辦國產衣料時裝表演，這都象徵著台灣生活水準的提升⁵⁷。

另外，在1967年國內首次舉辦第一屆國產毛衣皇后選拔大會，在比賽中參賽者穿著國產毛衣，做動態服裝

54 同註四八，頁150。

55 同前註，頁170。

56 同註五一，頁482。

57 同前註，同頁。

秀的展出；緊接在稍後的1968年5月6日，也於第一屆國產衣料服裝展中，舉辦「雲裳小姐」的選美活動。而這些被選出來的「毛衣皇后」、「毛衣公主」或「雲裳小姐」，後續並且擔任「服裝大使」，為國產服飾促銷作宣傳，這對國內服飾市場的銷售確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四、台灣服飾變遷受「文化體系」影響之分析

就此時期在「文化體系」中，對台灣服飾變遷，除了延續對日本文化的防堵。例如，在1962年9月17日，監委有鑑於日本影片唱片非法進口，造成風氣的敗壞，特提案修正⁵⁸；在1963年11月17日，學生展開「五不運動」：即不看日片、不買日貨、不講日語、不聽日本音樂、不讀日文書刊⁵⁹。

另外還有兩項新產生的主要因素，直接影響到台灣服飾的變遷：

其一是，大專院校服裝科系紛紛的成立。這些代表的學校科系計有⁶⁰：在1960年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系設立。在1961年實踐家專服裝設計科設立⁶¹。在1969年亞東工專紡織工程科設

立⁶²。由於這些服飾類科系的成立，大大提高了服飾專業人才的培育，有助於國內服飾的發展。

其二是，國內傳播影視的大躍進。眾所周知，電視的出現對人類文化造成極大的衝擊與影響。在1961年臺灣首家電視公司「臺灣電視公司」正式成立（於1962年10月10日正式開播），由於這種將影像、畫面快速傳送到每一戶家庭，讓觀眾及時看到資訊，改變了國人的視覺文化。其中特別是影像中所出現的國內外影星之穿著打扮，這對觀眾而言，具有學習、模仿的作用。當然這對國人普遍接受服飾流行文化有革命性的影響。

至於在電影方面，從六〇年代後期開始，「瓊瑤式」的電影，對男女主角塑造了一種「俊男美女」的形象。而螢幕中人物穿著打扮也成為當時時下年輕人士為最能代表流行時髦的模式，為流行提供了一個範本。1960年代後期台灣女性受西化的影響，裙子長度也顯著地變短。

陸、「1970年~1979年」之論述

一、台灣服飾變遷受「政治體系」影響之分析

58 同註五五，頁173。

59 同前註，頁176。

60 同註四四，頁269。

61 同前註，同頁。

62 同前註，頁270。



1970年代的台灣，在國際以及內政兩方面，雙雙出現極大的轉變。首先是台灣在國際關係的地位上，遭逢一連串重大的打擊，而陷入低迷。其如，在1971年10月26日中華民國宣佈退出聯合國⁶³。在1972年9月29日中、日斷交⁶⁴。在1979年1月1日中、美斷交⁶⁵。其次是在國內政治環境上，也出現了相當大的變革。例如，在1975年4月5日蔣中正總統逝世，由嚴家淦先生繼任⁶⁶。在1978年3月21日蔣經國先生當選第六任總統⁶⁷。在1979年12月10日爆發「美麗島事件」⁶⁸。而這些國際與內政的事件，也直接或間接地牽動到台灣服飾的發展。

就「中、日斷交」一事舉例而言，對於日本終止與我國的邦交，國人除了指責日本人背信忘義，更以實際行動來抵制日貨，當時更出現「拒買日本貨、拒穿日本服」的呼籲。因而由日本進口臺灣的服飾，化妝流行商品曾一時因遭到消費者的抵制，而頓時出現滯銷的情形。這種因國際政治外交問題影響到服飾流行，我們也可

從當時一則要聞看出一些端倪：「1973年3月7日台聯播資生堂化粧品節目〈美的世界〉，30分鐘內容都是資生堂工廠介紹，且出現很多日本國旗、日文，引起觀眾抗議而宣佈暫時停播⁶⁹。」

除了上述這些變動的政治環境下，促使服飾價值的變易之外；另外還有兩項重要因素，直接影響到台灣服飾的變遷：

其一是，在1970年代受到政治人物蔣經國先生的影響，而帶動起國內一般男性公務員，於七〇年代中期普遍流行穿著「青年裝」的現象。

其二是，在1978年11月2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准許國人出國觀光，並於1979年1月9日起實施⁷⁰。自此開始，臺灣民衆在世界各城市「大採購」的風氣、習慣便大受國際矚目（臺灣觀光團被視為是『高級流行品牌採購團』），此不但加速臺灣民衆使用國外高級流行品牌的主因；同時也奠定了國外服飾流行商品，紛紛在1980年代進入台灣市場的主要前因。

63 同註五九，頁249。

64 同註三七，頁22。

65 同前註，同頁。

66 同前註，同頁。

67 同註六三，頁302。

68 同註六六，同頁。

69 同註六七，頁264。

70 同註六八，同頁。

二、台灣服飾變遷受「經濟體系」 影響之分析

到了1970年代，臺灣經濟繼續朝向穩定的局面而發展，在國家經濟政策方面，除了加促國內工業的發展之外（在1970年2月25日，經濟部工業發展局成立⁷¹。另外則仍續以貿易為主，也因此於1970年7月1日政府成立了「對外貿易發展協會」⁷²，以加強並落實對外貿易工作，此直接影響臺灣在棉紡織品外銷市場的發展，稍早在1970年3月16日美國商務部統計，去年輸出美國紡織品，我國占第三位，較前年增加53.2%⁷³。而繼之於後，在1970年10月23日由經濟部國貿局與歐洲共同市場簽訂，以進一步拓展國內棉紡織品輸往歐洲的市場發展，此也開始了台灣棉紡織品可以輸往歐洲的序端⁷⁴。

在1971年8月23日，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表報告指出，我國去年經濟成長率在遠東各國居首位⁷⁵。另外在1971年12月31日，經濟部長孫運璿也於經濟部宣布去年重要經濟指標的成果：過去一年經濟成長率10.1%，工業成

長率16.8%，農業成長率4%⁷⁶。到了1971年，臺灣經貿發展繼續成長，GNP超過六十五億美元。對外貿易開始大幅出超，其出超金額高達二億一千六百萬美元。此時臺灣對外貿易為廿九億美元，躍升為世界第29大貿易國。同年7月23日政府推動第六期四年經濟計劃，GNP成長率高至95%，在此時國家經濟政策方向，依舊以貿易為主，並以更彈性的開放政策來推動，故而在8月25日政府准許國內廠商做轉口貿易，以落實並加強國家經濟朝海外貿易的方向拓展。對於紡織品的發展，經濟部並核定【紡織工業現代化計劃綱要】辦法。

繼之於1970年9月19日，經濟部擬定輔導方案，發展高級工業產品，電子、石化、紡織及精密儀器列為優先推動項目之後。政府更在1973年7月22日，列出紡織品等七項為重點工業，以做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方針。此似乎更明確地顯示政府對紡織工業的重視。

就在臺灣經濟一片大好的發展之下，不幸的在1973下旬出現了經濟風

71 同註六九，頁233。

72 同註四六，頁119。

73 同註五七，頁563。

74 同註七一，同頁。

75 同註七三，頁577。

76 同前註，頁579。



暴。其發生的原因是起因於10月6日所爆發之第四次中東戰爭，由於這次戰爭的爆發，遂引發了全球第一次的石油危機。這種因油價所造成的恐慌，震盪了全世界的經濟。臺灣原油產量本來就極少；經濟型態主要又是以貿易為導向，受到此次國際石油危機的影響，因而使得國內經濟發展受到極大的創傷。受到這一波經濟衰退的衝擊，國人在服飾消費能力明顯受到影響，民衆的穿著也連帶受到波及。當時一般的服裝店或量身訂做服店均陷入低彌的狀態。

面對這次石油危機所帶來的經濟風暴，政府也提出相對因應的「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以及在1973年12月16日，由蔣經國先生宣佈「十大建設」⁷⁷。藉此一方面希望界此次經濟逆境，來調整臺灣經濟的體質結構；另一方面也期望藉由發展重大建設來刺激國內需求，以求再創造下一波的經濟繁榮，而使得臺灣經濟朝向技術密集及資本密集的轉型，有更積極的助益。在對外經貿發展方面，於1975年8月12日國內籌組了「台灣世界貿易中心」⁷⁸以做為經貿外銷發展的重心。同年的11月25日針對國內織品，成衣外銷也成立了「中華民國紡

織外銷拓展會」，以整合紡織外銷的拓展（在1978年05月20日，紡拓會更成立紡織設計中心，即期望透過設計的提昇，來提高外銷市場的競爭）。

經過一番努力，國內經濟在1976年開始復甦，並逐漸恢復高度成長的局面，該年對外貿易又回復至出超的情勢，外匯存底此時也高達28億美元。緊接而來，在1978年臺灣經濟成長率突破光復以來最高的記錄為14%，出口成長率更高達35.7%成為世界第一。到了1979年OECD組織並將我國與韓國、香港、新加坡列為世界新興工業國。此時臺灣對外貿易突破三百億美元，成為世界第廿一貿易大國。這些種種在經濟上的成就使得臺灣博得「世界經濟奇蹟」之美名。

臺灣經濟在1970年代的情勢，受到石油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衝擊是非常顯著的，不過索性有政府適時提出應變的經濟措施，而渡過這短暫的危機。在紡織業方面，七〇年代的上半年時期，由於人纖工業的高速擴充，以及人纖服飾產品出口持續地成長，因而帶動了七〇年代下半年度人纖工業的發展與自動化。當然受到石油危機所帶來不景氣的影響，國內成衣外銷也深受打擊，這也促使許多外銷成衣

⁷⁷ 同註七十，同頁。

⁷⁸ 同註七二，頁162。

商，將一部出口的成衣，回銷到國內成衣市場，由於價份原本視做為外銷格低廉（業者為求現金，以折扣做促銷）而仍吸引了大批消費者的買氣。

當然，「國外知名流行服飾品牌的商品，開始大量引進台灣市場」的這項因素，對於台灣服飾的提昇，也直接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因為過去國內民衆若要購買外國品牌服飾商品，大都是從委託行買到的舶來品，然而由於國內民衆生活改善，國民個人所得不斷提昇，消費能力也相對提高。民衆因此有能力購買單價的流行服飾精品，此現象吸引國外高級流行服飾名牌廠商重視國內市場，並開始來台設專櫃。

三、台灣服飾變遷受「社會體系」影響之分析

在1960年代後期臺灣民衆受西方嬉皮流行文化及迷你裙款式流行文化影響，引起警方重視。害怕這種穿著打扮會影響社會善良風氣，故以妨害風化之名取締。到了1970年代，國內社會這股「服儀取締」動作，更加地擴大。

在1973年9月10日，教育部也配合政令，通令全國學校加強取締在校學生蓄留嬉皮長髮及穿著奇裝異服。不過有趣的是教育部在另一方面對學生的頭髮反倒是逐漸開放，在1978年

10月12日教育部通函省、市教育廳、局轉之各中等學校中學生髮式放寬，男生以三公分為度，女生可齊後頸髮根（在1972年4月10日當時教育部曾令『女學生頭髮以齊耳為準』）。

對於當時政府所實施的服儀的規範，電視公司也出現配合的行動措施，1972年3月16日華視訂定男藝人不得蓄鬚、留長髮等自律準則。中視為革新電視節目，在1979年6月4日也提出「八不」要求，即要求演員「不奇裝異服，不珠光寶氣，不袒胸露背，不蓬頭垢面」，節目內容中「不唱低俗肉麻的歌，不跳扭腰擺臀的舞，不說荒腔走板的話，不演胡鬧無聊的戲」。

雖然說七〇年代政府對長髮與奇裝異服是採取取締的措施，但當時流行文化並未見受到此取締影響而衰退。例如，在1974年2月的紡織工業成衣展；以及在同年的5月23日所舉辦的全國第一屆服裝發表會，就呈現迷你裙等流行款式，形成有趣的對比。

四、台灣服飾變遷受「文化體系」影響之分析

為了呼應當時社會風氣對服儀規範的要求，文化教育體系的學校也適時的配合。在1970年11月3日，由內政部所公佈的【國民禮儀範例】，即是希望藉此能對國民生活（包含服儀



）有個教育規範的標準，以做為民衆遵循的依歸，首先就從各級學校開始加以落實。而更進一步的，就在1971年1月22日，省教育廳宣佈，全省國民小學生制服自下學年起統一，女生為白、黃上衣，藍短裙及藍長褲；男生為白、黃上衣，藍短褲及黃長褲⁷⁹。在1973年9月10日，教育部通令全面加強取締在校學生蓄留嬉皮長髮，穿著奇裝異服⁸⁰。這都顯示透過教育對學生服裝規範有所要求。

「意識型態」對於服飾文化的發展往往也會成為影響的主因。七〇年代起本土意識開始受重視，這原本是很單純對文學的一種省思，但卻引發出鄉土文學的論戰，這股對文學的激辯論戰很快的轉而激起「回歸鄉土、關懷本土」的主張，並形成一股濃厚的本土意識。

除了對文壇創作產生影響之外，也同時影響電影、美術、設計創作而蔚為風潮。同樣的，在服裝設計方面，於七〇年代後期，有些服裝設計師受此影響，在設計上也轉而希望能融入自身文化，做為設計理念的表達，因而出現以手工「蠟染」、「絞染」方式設計富有民俗風格的服飾，這與

當時深度西化的成衣，恰巧形成極端的對比。

另外，到了七〇年代，台灣服裝流行雜誌也有了新的發展，在此之前有關平面流行資訊，大都是以美國或日本為主，國內尚未見出版有較專業的流行資訊雜誌，然而在1975年10月10日與1978年5月，國內雜誌界分別成立【流行雜誌】與【王榕生雜誌】二份專業的服裝流行雜誌^{81、82}。此可看出國內民衆對服裝流行資訊的需求有比過去更加重視。（圖12）

柒、「1980年~1989年」之論述

一、台灣服飾變遷受「政治體系」影響之分析

1986年10月15日執政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的解嚴政策（『解嚴案』並於1987年7月14日由蔣經國總統宣告自翌日起解嚴，而結束自1949年11月2日開始由行政院所宣佈的全國性戒嚴）。

當然，解嚴的影響，其不單純是國家政體政治上的問題，它更呈現出臺灣邁入另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在價值觀上形成出不同於前的評量標準，這種自由、民主的發展，的確提供臺

79 同註七四，頁250。

80 同前註，頁265。

81 同註六二，頁270。

82 同前註，頁271。



▲ 1970-73年「喇叭褲」為當時繼「迷你裙」之後所崛起的一項流行重點。
〔本圖為研究者個人收藏〕圖12

灣整體轉型一個相當好的良機，而呈現出活潑、多元化的新局面。

無疑的，八〇年代台灣服飾發展，受到國內「解嚴」在國策上轉型期所帶動之活潑性、多元化的影響（例如，在1987年1月12日，教育部開會決議，廢除學生髮式的限制學生髮禁的解除，此與當時國內政治體質開放的轉型，有著直接的關連或淵源）；加上國民生活改善、消費意識與能力的提升；以及國外品牌的引進，國內自創品牌的開放等因素的影響，都著實地反映在臺灣民衆衣飾穿著上水準的提高。

另外在國內政治發展的方面，於1980年代也出現了一項重大的變革，那就是在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總統逝世，由李登輝先生繼任。而開始進入「李登輝時期」。

根據研究者個人綜觀李登輝在掌握台灣政權之後，我認為由於他的主政態度，也連帶影響台灣服飾往後的發展，歸納出四項重點：1.對於台灣服飾朝向開放性、多元性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2.對於強調本土草根性的「普羅流行文化」具有帶動的影響。3.對傳統中國文化有所抑止，而形成出「去中國化」的意識型態。



4. 對「哈日風潮」在國內的發展有鼓舞的影響。

二、台灣服飾變遷受「經濟體系」影響之分析

在七〇年代，臺灣先後於1974年與1979年，分別遭逢到二次國際石油危機所帶來在經濟方面的衝擊。受此衝擊不但造成國內經濟成長率的減緩，也直接影響到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這種影響同樣地延續到八〇年代。不過，這種衝擊並未打敗台灣的經濟命脈，台灣經濟狀況也很快地復甦，到了八〇年代上半期，臺灣經濟的成長率，其平均值仍能維持在8%。

不過，雖然說紡織相關產業指數，於八〇年代上半期，其平均值也有近6%的年成長率，然而這些成長狀況，似乎以大不如前。過去一直為國內出口最大宗的紡織品，到了1984更被電子機械產業品所取代，在1986年臺灣的資訊工業產值提高為廿一億美元，佔全球第七大，而成為國內新興主流的產業。對於國內經濟體的這種改變，根據經貿學者的分析，認為這些現象，不但說明了臺灣的紡織和成衣服飾業已步入了成熟的階段，也看出臺灣經濟產值與型態結構的轉變。紡織成衣產品不再是外銷出口的主力了。

的確，國內紡織成衣業所面臨的

，確實不僅是衰退，甚至是出現落沒的局面。深究其原因，除了受因石油危機所帶來的衝擊之外，其實尚有下列四項主因影響所致：

其一是，就是國內工資的提高。

其二是，「大家樂」賭風的衝擊。

其三是，是勞動作業員的流失。

其四是，業者無法快速因應國際的變化。

不過，為了挽救國內紡織成衣業在八〇年代所處的危機，也出現了一些因應之道，最普遍的就是紡織成衣場，就是將廠房生產線遷移至海外，以期重新取得競爭優勢。以及另一項解決之道，那就是在當時國內，喊出了「提高附加價值、增加競爭能力」的口號。也因此「建立自創品牌」觀念開始在國內開始熱絡。（圖13）

相對於國內「建立自創品牌」發展的趨勢，「國外知名服飾流行品牌，大量湧入國內市場」，這項因素也深切地影響台灣服飾發展的變。

三、台灣服飾變遷受「社會體系」影響之分析

臺灣在邁入八〇年代以後，受到政治與經濟雙向的影響之下，造成社會環境與社會結構相當大的變異。即一方面在1980年代中期政府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以及在1988年1月13



▲ 在1980年代台灣服裝設計師也開始積極從事品牌的開發，此為1988年由國內設計師所開發的兩款式設計。
〔本圖為研究者個人收藏〕圖13.。



日，蔣經國總統逝世，由李登輝先生繼任而進入「李登輝時期」。政治反對運動蓬勃發展，各類型的社會運動亦不斷出現；另一方面，大量勞動力移往都市，從事服務業人口快速增加，新事務、新刺激取代傳統的價值觀，國民所得不斷增加，生活品質提昇。這些種種的發展，都使得臺灣社會因而產生「質」的變化。而社會這種「質變」，也造成社會風氣開放；社會價值多元化發展的基礎。當然，這種發展也直接影響到台灣服飾，而形成出兩項重點特色的發展：其一，穿著較前更開放且更在乎樣式的變化與重視流行。其二，穿著價值觀不僅多元也更強調個人主義的色彩與表現獨特的風格。

在這種重點特色的啓發下，社會出現一群喜用名牌、講究生活品味的高消費族群年輕人「雅痞族」。由於他們追求名牌、講究時尚；以及考究個人的品味，的確為國內服飾消費市場帶動起年輕、高流行品牌的風行。另值得一提的是在1988年美國「Hang Ten」休閒服成衣專賣店來台灣成立分公司，並積極在全省開設專櫃。此開拓了休閒服飾在國內流行的風潮。

四、台灣服飾變遷受「文化體系」影響之分析

國內在八〇年代之前的七〇年代

，對於服飾流行平面報導資訊的傳播，大凡主要的仍然是以一些非專業性的雜誌為主，至於較專業的國內外服飾流行雜誌則相當有限，且尚未普及。然而到了八〇年代，服飾流行平面報導資訊，在國人對服飾流行更加的需求與重視下而又了大幅度的進展。此時除了歐、美、日各國流行雜誌紛紛引進；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國內此時也出現多份相當專業的服飾流行雜誌。

八〇年代臺灣衣飾文化的發展，另一項特色就是在服裝設計中融注「中國式的文化」於其中，其實這項發源自於七〇年代後期，起自於富民俗風味的手染服飾為開端，這種強調本土民俗風格也延續到八〇年代初期，並深受歡迎。另一方面，在八〇年代初期也出現改良式中國服，一樣大受歡迎。繼之而後，這股本土性的中國風設計在八〇年代受國內建立品牌的影響，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也就是當時國內設計師已有所自覺，並進而認知道：若要開創品牌，定要以自身文化為基礎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設計特色，倘若只是跟隨西方流行款式開發相類似的款式，必然無法與國外品牌相競爭，因而喊出「中國風」的口號，來做為國人建立開創品牌信念的總目標。

在八〇年代，影響臺灣衣飾文化

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當推「學生髮禁的開放」。1987年1月12日教育部開會決議，廢除學生髮式的限制，而予以放寬。並完全廢除以「限制」或「不得」等字眼來規範學生頭髮，授權學校校長依各地區環境及氣候等因素，自行做適當的規定。教育部將此決議函送省市教育廳局，並將原有於1978年訂定的「規定中學生髮式」及1974年訂定的「大專院校男生蓄髮標準圖示說明」全部廢止。自從髮禁的開放之後，的確改變了過去學生階段對服宜的審美價值。過去中學生在這個階段根本無須做打扮，但髮禁解除之後，髮廊生意受此影響而出現業績的上升；少男、少女服飾銷售情形也有顯著的提昇，許多服飾流行商品更備受中學生的青睞，從服儀上也分佈出示否為中學的在學生，過去那種強調「軍訓式、教條式、僵化式的教育模式」因而遭到衝擊。

在八〇年代台灣還有一項文化層面重大的變化，那就是國內對「日本文化」由抑止轉而接受，例如在1984年1月4日，新聞局電影處宣布進口4部日片，為自1973年禁止日片輸入以來首次開禁。無疑的，此為光復之後，台灣就一直對日本文化抑制的情形，出現了重大的轉圜。當然，由於這種解禁，使得日後「日本流行文化」能大舉入侵，而造成「哈日風潮」的

盛行。這也使得台灣服飾流行文化，更顯著的以日本流行風為準則的發展。

捌、「1990年~2000年」之論述

一、台灣服飾變遷受「政治體系」影響之分析

在九〇年代台灣政局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重大的變化，其中最具代表的政治要聞，就要算陳水扁在2000年3月18日當選中華民國總統，而緊接在5月20日政黨正式輪替（由民進黨執政，國民黨下野變成在野黨）。

其實早在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前的1990年代，台灣政治情勢的發展就已出現重大的變化。歸結而言，這一連串的政治發展，對過去傳統政治價值的否決與批判。就在此政治環境更趨於「自由民主」的發展之下，研究者個人認為，九〇年代台灣服飾相當顯著的形成出「深度西化」、「世界國際化」、「多元文化」三項重點趨勢，而這也加促了台灣民眾更普遍地塑造出「重視高度流行性」的穿著習慣。

二、台灣服飾變遷受「經濟體系」影響之分析

在九〇年代國民黨執政時期，雖然國際經濟大環境趨於衰退，但由於國內經濟政策方向的明確，這使得台灣的經濟發展，依舊能維持相當不錯

的正成長。

由於國內經濟維持正成長的趨勢，加上國民所得的攀升，這都使得國內民衆生活品質與消費能力持續的提昇。相行之下，國人對物質的要求與消費享樂也更加重視。當然，這也連帶促使台灣民衆，對衣著態度更普遍地呈現出一種「高度流行消費文化」的觀點。例如，民衆認為「使用社會所認可的名牌可以突顯自己的地位和風格之時」；以及一般人更熱衷對流行時尚風潮的追逐。（圖14）

三、台灣服飾變遷受「社會體系」影響之分析

同樣是受到國內政治趨於講求「民主自由」的發展；以及經濟環境趨向「高度物質消費化」的經濟發展，這雙重的影響之下，也使得國內社會風氣逐漸地更加的「自由、開放、多元」。

無疑的，在九〇年代期間最能顯示「社會風氣開放」的例子，就要算是國內女藝人紛紛拍攝表現裸露性感的寫真集。當然這些寫真集每次的出版，不僅會帶來談論的話題，更重要的是它也為民衆重新建構出另一套新的「社會價值觀」。尤其是直接的影響民衆對穿著態度，更勇於表現裸露與性感，對於這種現象社會也回以正面的評價（此打破過去自台灣光復以

來，台灣民衆服飾保守的價值觀）。此顯示「社會風氣」對服飾變遷所帶來影響的事實。

另一項也是受到「社會風氣」而對服飾變遷帶來重要影響的例子，就是今日都會年輕學生課餘打工的風行。其實他們打工的目的，倒不是為了生活所需（多半他們的家境都不錯），而是希望能多賺些錢，以便能自由的購買價格昂貴的流行消費服飾商品。由於這些年輕人勇於花錢在穿著打扮，敢於購買高單價的流行商品，這也促使業者從國外引進以年輕人為主



▲在1990年代台灣民衆對服飾流行更加的重視。〔本圖為研究者個人收藏〕圖14

的高價服飾；或是由國內業者針對年輕人的市場開發高價流行商品。

受到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我們不僅看到今日年青人的穿著打扮，融入其個人特有、獨特的造型，以塑造出屬於年輕風格的現象；而且就國內服飾在社會整體現象來看，我們也發現有趨於年輕化的發展。

繼美國「Hang Ten」休閒服成衣專賣店，在1988年來台灣成立分公司之後，於1992年香港「Giordano」（佐丹奴）休閒服，也在台設立連鎖專櫃。由於這些來自國外「休閒服成衣」專賣店紛紛來台的設立，確實改變了民衆的穿著態度與習慣。特別是這些店積極的在全省都會開設專櫃，深入社會。而其大眾化、低單價、具流行感、具休閒生活化、強調舒適性的商品定位目標，確實相當普遍地帶動了國內社會休閒服飾的風潮。當然這也為台灣社會中強調高單價的知名流行品牌的發展，提供另一條平行發展的脈絡。

四、台灣服飾變遷受「文化體系」影響之分析

當然影響國人對服飾流行文化的重視，傳播媒體一直都扮演著關鍵而

決定性的角色：首先在國內電視傳播方面，到了1990年代有了相當重大的突破，那就是在1992年1月30日行政院通過有線電視法草案，並預定開放48家電台⁸³。在1994年3月1日台灣第一個有線電視新聞網「真相新聞網」開播⁸⁴。以及在1994年7月1日全民衛星電視台開播⁸⁵。自此便改變過去只有三台電視頻道的局面，使得民衆有更多的機會能更廣泛；甚至更不同的接觸到不同的評價看法。當然由於電視媒體頻道的開放與多樣；加上電腦資訊科技文化中傳播快速的擴展（如網際網路），這也連帶激起有關流行文化資訊的活絡。

在傳播媒體項目中除了電視之外，國內流行雜誌也同樣有突破性的發展，那就是國際知名的服飾專業流行雜誌開始紛紛來台成立中文版，而首開先河是《Harper's Bazaar》，這份雜誌於1990年1月19日，以《哈潑時尚台灣國際中文版》一名，正式在台灣發行出版。繼之而後1991年法國《ELLE》國際中文版在台出刊。在1992年美國《COSMOPOLITAN》國際中文版在台出刊。在1994《美人誌》出刊。在1995年美國《VOGUE》國

83 同註七九，頁450。

84 同前註，頁465。

85 同前註，同頁。



際中文版在台出刊。

至於服飾方面，國際高級知名流行服飾名牌，在1980年代開始大量擁入國內市場後，到了1990年代則更加持續這種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國際流行服飾界享有反傳統、前衛風貌的知名服飾設計師『Jean-Paul Gaultier』與『Vivienne Westwood』其流行服飾品牌也在1992年開始來台設立專櫃，這似乎也說明了，台灣的民衆消費者，在選購服飾時更趨向多元化的方向來選擇。

另一方面，與高級流行服飾相對照的『具大眾化流行性的成衣』也在國內以連鎖店及專櫃的經營型態快速、大量的出現。這種重視流行性的成衣，以大眾化的消費價，加上時時的折扣，的確普遍地深得一般消費者的青睞，此對國內發展出所謂的『高度流行性的流行文化』確實有著極大的影響。

我們了解90年代國內服飾發展若干的重要背景之後，緊接進一步來探討，90年代時期，台灣流行服飾文化的現象其實值得風貌之所在。

以下就針對1996、97夏季台北地區都會時髦的少淑女為探討對象，分別從『整體輪廓與重點特色』、『搭配』、『服裝款式』、『鞋子』、『皮包或背包』、『色彩』、『布花圖案』、『頭髮』、『裝飾』與『佩飾

或裝扮』等九大項進行深度的分析：

女性服飾穿在身上看起來似乎比正常尺碼要小一號，而呈現出『緊身』、『短』、『小』的服飾形體輪廓美學。這種看似『縮了水』的服飾款式與1980年代所流行強調寬鬆大一號的款式正好成對比。而成為96年最具代表的風格特色之一。在1980年代開始大量湧入國內市場後，到了1990年代則更加持續這種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國際流行服飾界享有反傳統、前衛風貌的知名服飾設計師 Jean - Paul Gaultier 與 Vivienne Westwood其流行服飾品牌也在1992年開始來台設立專櫃，這似乎說明了，台灣民衆的消費者，在選購服飾時更趨向多元文化的方向來選擇。

無疑的，到了1990年，日本東洋文化更是大舉入侵。甚至引發了「哈日風潮」在台灣大流行的情形。當然這種外來流行文化也深切的影響台灣服飾的發展。

另外，國內教育發展在1990年代也出現重大的轉變。那就是政府於1994年9月21日，成立了【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以推動教育改革，歸納本次教育改革所提出的重大改革目標，大體上主要是以「自由、開放、多元」為基礎理念。其不僅要解除教育體制上的不當管制，還要祛除錯誤觀念與習慣的束縛，以尊重學習

者的主體性與建立多元化的體系。即視「教育鬆綁」是一種符應社會民主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重建工程。

就是因為有這項重大的變革，也助長國內民衆在面對「衣飾文化」，以「自由、開放、多元」的價值觀來看待。而尤其是青年學子在此價值觀的牽動之下，在穿著裝扮上不但更趨於活潑、多樣，也更能表現出自信與自我，而較前有著極重大的轉變。

壹拾、結論

一、「文化因素」確實是影響台灣服飾變遷的主要因素之一。

針對「文化因素」對台灣服飾變遷影響的探討，以下研究者就根據前述的論證，按不同時期列舉出最具代表的證據來檢證。

在「日據前期的綏撫時期」(1895年~1919年)，由於台灣總督府於1915年在台中設立了第一所公立中學校，當時學校規定學生舉凡食衣住行皆採日式，故開啓了男學生著「日式西化的制服」，而一改之前台灣子弟上學穿著中式款式服飾的情形。此顯示文化體系的教育政策，也成為改變台灣民衆穿著模式的一項主因。

在「日據中期的同化時期」(1919年~1937年)，起因於台籍菁英份子，對自身文化形成一種自覺的意識，而發展出「新文化運動」。縱觀新文化

運動時期，從1920年到1932年這十多年的發展，在這長達數十年的發展運作，確實對臺灣的思想價值，造成極深遠的影響。同樣的，這種文化思維的影響也反映在服飾的兩項方面：其一，由於當時「新文化運動」藉由保留傳統文化，以作為抵抗日化的依據，這使得中式傳統服飾有存在的條件，而未造成臺灣的服飾普遍形成日化現象。其二，由於當時「新文化運動」強調的是一種進步的思維，這也提供了台灣民衆對具有現代精神的西式服飾能接受的基本理由。由於有這兩項要素的並存，也促使當時臺灣在衣飾文化的發展，能共容「中式」、「西式」、「中西合璧」等三種不同款式的空間。

另外，此階段在「文化體系方面」，除了受到「新文化運動」對台灣服飾變遷所帶來重大的影響之外；另外受到「教育制度發展的變易」，也同樣深切的影響台灣學生與年輕人，在當時（以及日後）建立服裝意識態度的根源。其肇因於從一九二〇年代中期開始之後，公學校的男生開始著「日式西化」的學生服。中學校女生也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穿著「日式西化」的學生服。這種情形的產生，使得台灣學生制服，不論是衣服、鞋子、帽子、書包等都有一定的式樣，並且以日本為本。此說穿了，就是日本



殖民政府，希望透過日式教育，使得台灣年輕學子「同化」成為日本人，即藉由教育方式欲圖達到，「消滅臺人固有文化的信仰，並建立起具有大和文化意識的新世代子民」。

在「日據後期的皇民化時期」（1937年~1945年），受「皇民化運動」影響，而出現「廢除中式傳統服式，鼓勵台灣民衆穿著和服、國民服、改良服」。無疑的，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所推行的皇民化文化改造運動，他們這種透過服飾文化的改造，是期望藉由外在穿著，進而培養出內在的日本國民意識。

在「1945年~1959年」時期此時，在文化方面，其最主要的重心有二：其一，加強台灣民衆建立「中國文化」的意識；並快速去除台灣民衆的「日本文化」意識（例如嚴禁台灣民衆著日式軍服、國民服、穿日式木屐）。其二，建立「新生活運動」。受此影響，學生的服儀要按規定，接受服儀規範的要求，以使得學生養成具有規規矩矩的「新生活精神」。

在「1960年~1969年」時期，除了延續對日本文化的防堵之外，另外還有兩項新產生的主要因素，直接影響到台灣服飾的變遷：其一是，大專院校服裝科系紛紛的成立。其二是，國內傳播影視的大躍進。

在「1970年~1979年」時期，爲

了呼應當時社會風氣對服儀規範的要求，文化教育體系的學校也適時的配合。除此之外，「意識型態」對於服飾文化的發展往往也會成為影響的主因。七〇年代起本土意識開始受重視。受此影響有些服裝設計師，在設計上也轉而希望能融入自身文化，做為設計理念的表達，因而出現以手工「蠟染」、「絞染」方式設計富有民俗風格的服飾，這與當時深度西化的成衣，恰巧形成極端的對比。

在「1980年~1989年」時期，服飾流行平面報導資訊開始蓬勃發展，這也加促國人對服飾流行的重視。另外，在八〇年代影響臺灣衣飾文化發展還有一項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學生髮禁的開放」，自從髮禁的開放之後，的確改變了過去學生階段對服儀的審美價值。

在「1990年~2000年」時期，影響國人對服飾流行文化的重視，傳播媒體是扮演著關鍵而決定性的角色。例如「有線電視」的開播與普及；電腦資訊科技文化的快速擴展（如網際網路）；國際知名的服飾專業流行雜誌開始紛紛來台成立中文版。由於這些流行資訊的蓬勃，也為台灣服飾流行文化的發展帶來生機。另外，國內教育發展在1990年代也出現重大的轉變。那就是政府於1994年9月21日，成立了【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以推動教育改革，歸納本次教育改革所提出的重大改革目標，大體上主要是以「自由、開放、多元」為基礎理念。其不僅要解除教育體制上的不當管制，還要祛除錯誤觀念與習慣的束縛，以尊重學習者的主體性與建立多元化的體系。即視「教育鬆綁」是一種符應社會民主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重建工程。受此文化價值的影響，台灣民衆在衣著態度也更顯「自由、開放、多元」。

二、在同一個階段，造成台灣服飾變遷，並非只是受到單獨因素的影響所致。

有關台灣服飾變遷，在同一個時期階段，是否大都受到單獨因素的影響所致而形成的？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透過前文各單元內容的論述，按不同時期列舉出最具代表的證據來檢證。

在「日據前期的綏撫時期」（1895年~1919年），台灣服飾變遷最具代表的「男性辮剪、女性解纏足」，其之所以能順利達成變革，除了受到當權者透過政治力，有計劃性的推動之外，其實還有台灣地方人士，基於個人的自覺與省思而配合。除此之外，若無「大環境」適時出現中國大陸推翻滿清、結束帝制的產生；以及西方強勢文化以其優勢的衝擊而來，單憑

一項獨立的政治因素影響，就可產生變遷的。

在「日據中期的同化時期」（1919年~1937年）。雖然說此階段日本殖民政府，期望透過「同化政策」的政治力來改造台灣，甚至這種殖民政策的企圖，也藉由教育途徑積極落實在年青一代的學生身上，即除了灌輸台灣子弟成為日本人的信仰意識之外，也透過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穿著同一款式的制服，來達到「內外改造」的目的。不過，由於當時在台灣也同時出現，由知識精英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因為有這項運動的推展，而其相當程度的抑止了「日本同化」的進展。這也使得台灣當時的服飾變遷，不致於快速淪為日化，或是產生「僅以日式的衣飾文化為標準」的局面。

在「日據後期的皇民化時期」（1937年~1945年）。無疑的，此時日本殖民政府，在殖民政策上採取更積極的「皇民化」，即期望藉此切割台灣民衆與中國大陸血緣的關係。也因此在此階段，確實顯著地看到，受到這項因素的主導影響之下，再加上其他如社會文化等層面的配合，台灣民衆服飾穿著呈現出，相當程度的「去中國化」現象。

在「1945年~1959年」時期。台灣於1945年結束日本統治，進入中華



民國的時代之後，受到這項政體轉換的重大影響之下，台灣民衆穿著除了繼續維持西式服飾之外，日式服飾（包括日式軍服、國民服、日式木屐、日式和服）也因而快速的消逝；而代表中國女性形象的旗袍款式，則又開始成爲一項主流。此階段在「去日本化；以及建立中國化」議題上，不論是社會或文化層面，也都形成出一種共識，而影響台灣服飾的變遷與發展。

在「1960年~1979年」時期，由於國內政治趨於安定，台灣在國際安全上適度得到的保障，加上全民一致的努力，這使得台灣在經濟方面有了良好發展的發展。受到台灣經濟蓬勃發展的影響，台灣民衆的穿著有了極大的改變。而這種改變，不但大大提昇了國人在衣飾消費的能力；加強了臺灣民衆對審美的需求，也進而促使國人更加積極地追求衣著的時髦性與流行感。

在「1980年~2000年」時期，首先是政治方面，受到1980年代「解嚴政策」的影響，其不單是影響國家政治上的發展，它更促使臺灣邁入另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在價值觀上形成出不同於前的評量標準。這種自由、民主的發展，的確提供臺灣整體轉型的一個良好企機，而呈現出活潑、多元化的新局面。在經濟方面，由於國內

經濟維持正成長的趨勢，國民所得的攀升，民衆生活品質與消費能力持續的提昇，故使得國人對物質的要求與消費享樂也更加重視。在社會方面，由於國內社會風氣的開放，一些新事務、新刺激逐漸取代傳統，而造就台灣民衆產生求新求變的價值觀。在文化方面，除了受到後現代文化價值的影響、傳媒的發達以及國際流行資訊在台灣活躍；再加上「學生髮禁的開放」與「教育改革」的推展，這都使得台灣文化發展更趨於「自由、開放、多元」的步調。而如此種種因素的相互呼應，也都直接影響到台灣服飾，而形成出「穿著較前更開放且更在乎樣式的變化與重視流行消費」；以及「穿著價值觀不僅多元也更強調個人主義的色彩與表現獨特的風格」。

主要參考文獻

- 七十級畢業委員會（編著），繼往開來，台北：實踐家專服裝設計科，1981
- 中國時報（編著），台灣：戰後50年，台北：時報文化，1995
- 何飛鵬（編著），台灣經濟影像，台北：卓越文化，1987
- 宋光宇（編），台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台北：東大，1993
- 宋光宇（編），台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1993
-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特刊，台北：聯經，2001
- 時報文化編輯委員會（編著），珍藏20世紀台灣，台北：時報文化，2000

- 張之傑（編著），台灣全記錄，台北：錦繡，1990
- 戚嘉林，台灣史，自印，1998
- 黃金鳳，臺灣地區紡織產業傳，台北：中華徵信所，1988
- 黃瑞祺，現代與後現代，台北：巨流，2000
- 楊碧川（編著），台灣歷史辭典，台北：前衛，1997
- 梁華璜，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台北：稻香，2001
- 葉立誠，台灣服裝史，台北：商鼎，2001
- 葉至誠，社會學導讀，世新大學，2000
- 遠流台灣館（編著），台灣歷史年表，台北：遠流，2001。
- 劉國瑞（編著），台灣發展圖錄，台北：聯經，1991
- 賴志彰（編著），台灣霧峰林家留真集，台北：自立報系文化，1989
- 簡後聰（編著），福爾摩沙傳奇－台灣的歷史源流（上、下兩冊），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2000